

夕阳红

特刊

2017年第3期

中国人民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第五十八期



RUC80

1937-2017

中國人民大學

建校八十周年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80 ANNIVERSARY





《人大印象》

绘图：俞昆（人大艺术学院校友留法艺术家）

夕阳红

之声



XI YANG HONG ZHI SHENG

中国人民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目录

CONTENTS



校庆专刊



■ 《夕阳红之声》工作室

联系电话：62513643 62510615

电子邮箱：LTX@ruc.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中国人民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邮编：100872

■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中国人民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 封面设计

吴文越

■ 内文设计

袁凌

■ 印刷

北京经典无限印刷有限公司

■ 2017 年 9 月出版

请文章作者及时与工作室联系领取纪念品，恕不支付稿酬。

特别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 80 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 4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发布 80 周年校庆主题和标识的公告（第二号） / 5

中国人民大学 80 周年校庆公告（第三号） / 7

人民大学师生迎接 80 周年校庆学生原创话剧《吴玉章》公演举行 / 8

迎接人民大学八十华诞《人民大学赋》
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 12

《人民大学赋》

——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作
李东东 / 17



RUC80
1937-2017
中國人民大學
建校八十周年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80th Anniversary



中國人民大學
建校80周年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80TH ANNIVERSARY
1937 - 2017



校庆纪念文章

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 / 20

郭影秋：众人眼底自成碑 / 24

成仿吾：在党的教育事业中“长征” / 29

学习三年 钟爱历史 王一帆 / 34

学习 继承 发扬

——读《人民日报》有感 李宗惠 / 39

难忘的铁一号学习生活 陈智为 / 41

献礼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

齐庆才 / 44

喜迎建校八十周年 杨竞儒 / 48

理论结合实践 从教室走向工厂

——记王嘉谟建国初期社会教学

傅积嘉 / 49

改革开放中首创在高等院校内实行学院制

——陈云同志为计划统计学院题写院名

吴微 / 53

从贫苦农家走出的文化巨匠

——读冯其庸先生《风雨平生》有感

叶君远 / 55

“孝老爱亲” 杨先举 / 60

青春年华，又在眼前 杨汝芬 / 62

回忆罗列主任 于庆田 / 64

难以磨灭的印象 刘佩弦 / 67

您好，我的乳母——华北联大！ 穆扬 / 70

华北大学入学记 张景良 / 73

华北联合大学的课余生活 马琦 / 76

战火中的青春 刘志 / 78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当2017年金秋灿烂，层林尽染之季，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八十华诞。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向全体师生员工，向心系母校发展的广大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八十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她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烽火中诞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成长，在“文革”的艰苦岁月中磨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生，在新世纪的征程中腾飞，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发展成为“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十载筚路蓝缕，不忘初心。中国人民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和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涵育了生生

不息的发展动力。无论是在艰难困厄中，还是在和平环境中，一代代人大人始终不忘“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崇高理想，始终不忘“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光荣使命，始终不忘“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始终不忘“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责任担当，铸就了伟大的精神丰碑，缔造了永远的精神家园。

八十载春华秋实，再创辉煌。80周年校庆既是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发展成就的重要时机，也是迈向新征程、再创辉煌的重要机遇。学校将做好办学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办学成就展示与形象传播、未来展望和目标引领等工作，充分展示学校建校80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发展的成就，努力办好此次盛典。目前，校庆筹备工作已正式启动。我们热切期待广大校友重返母校，再叙情谊，追忆求学岁月，共襄发展大业；我们衷心希望所有关心和支持人民大学发展的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参与校庆活动，共谋人大未来！

专此敬启，恳祈周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发布 80 周年 校庆主题和标识的公告（第二号）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

本次校庆将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为主题，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以贯之、广为延续的光荣传统，凝结了学校从战火中走来、在时代中奋进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学校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学校崇尚人文、与时俱进的学科特色。

80年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品格已经融入了人大人的血脉之中，一代代人大人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宗旨，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求真务实，推动学校从“战火中的大学”一路发展壮大为“新国家的新大学”，并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母校 80 华诞引起了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的热烈反响和积极参与，学校知名校友、北京知行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章叶青团队的设计方案和学校青年教师、艺术学院郑晓红副教授团队的设计方案将成为中国人民大学 80 周年校庆视觉标识。

章叶青校友方案以毛泽东同志书法中的“人”和“大”字为渊源，加以变形运用，形成了“人大”“八十”相融合的形象符号，简洁大方，底蕴深刻；郑晓红副教授方案源自学校名称英文缩写“RUC”的组合，形成“80”字样，构思巧妙，现代感强。两套方案相互补充，相互呼应，前者主要运用于重大活动、学术会议等，后者主要运用于志愿服务、文体活动等。

校庆期间，学校拟围绕校庆主题，着力梳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 80 年”的辉煌历程，举办高水平论坛、座谈会、研讨会；同时推出大型专题电视纪录片、系列特色展览和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校庆出版物、文章等。校庆日前夕，学校将举办专场音乐会、主题戏剧演出等文化活动及新校区奠基仪式。学校还将举办隆重简朴的校庆日活动，包括庆祝大会、体育比赛及文艺晚会等。学校拟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直播校庆重要活动。

巍巍宝塔山，浓浓人大情。我们诚挚地邀请广大海内外校友重回母校、畅叙友谊，也热忱地期盼能与社会各界人士共襄盛举、同谱华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 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公告(第三号)

丁酉仲秋，丹桂飘香。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0岁生日。

八秩春秋易逝，不忘初心来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八十载栉风沐雨，学校发展成为“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

献。为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学校将于10月3日校庆日前后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隆重而简朴地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重逢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学校欢迎各界校友于校庆日重返母校，共庆华诞。届时，学校将在东门内求是园安排各学院接待返校校友。80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在敞开怀抱，热切期盼各界宾朋、校友的到来。让我们在这个美丽时节相聚在首都北京，相聚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叙深情，共展宏图！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迎接 80 周年校庆 学生原创话剧《吴玉章》公演举行

9月9日和10日晚，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学生原创话剧《吴玉章》在明德堂上演，拉开了校庆80



话剧集中描写了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从1948

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北京团市委书记熊卓、副书记李健、袁慧、陈昶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红培等上级团组织和兄弟高校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副校长洪大用，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副校长刘元春等学校领导，吴玉章老校长孙女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等吴老家人出席活动，学校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离退休老教师代表等2000余人观看演出。

年至1966年先后任华北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至逝世期间的故事，再现了吴玉章老校长为创办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新型高等教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历史过程，展现了吴玉章老校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中国新型高等教育开拓者的高风亮节和卓越贡献，表达全校师生对吴玉章老校长的深切怀念和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

9日是2017级新生报到的日子，当天晚上，话剧《吴玉章》举行迎新生公演专场，近千名2017级新生在入学第一天以观看话剧《吴玉章》的方式接受



校史校情教育，上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入学第一课”。吴老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艰辛历程让新生感动不已，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地位和奠基贡献让新生倍感自豪。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观众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话剧剧终时以视频形式带领新生回顾了人民大学建校80年来的学校面貌变迁，使新生直观感受和了解学校80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建设成就。

刘伟在观看话剧后亲切慰问演职人员，他对话剧的成功演出表示祝贺，对全体编创、演职人员的投入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吴玉章》作为一部人大学生自己创作排演的原创话剧，融入了同学们的艺术激情与创作热情，融入了

同学们对学校的深厚感情和对学校精神的传承，是一部打动人心、充满敬意的剧目。中国人民大学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红色基因”，其重要源头就体现在吴玉章老校长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身上，吴玉章老校长崇高的精神品质、伟大的人格魅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大青年始终铭记于心，自觉传承弘扬。

10日是第33个教师节，当天晚上，话剧《吴玉章》举行教师节公演专场，学校各学院教师代表、机关部处教职工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以及校友代表、学生代表济济一堂，共同观看校庆80周年原创话剧。在场观众从话剧第一幕吴玉章领导荣县起义起便被剧情所吸引，并随着剧中人



物再次回到了华北大学培养“万千建国干部”、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典范的那段光荣历史，当看到舞台上学生手擎华北大学校旗走过天安门金水桥，吴玉章校长宣布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等场景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剧目尾声，吴玉章走完一生之际，与妻子游丙莲阴阳相隔、念念不忘，《哭吾妻游丙莲》字字泣血、声声感人，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许多师生眼含热泪。全剧最后剧中人物集体登台，在“吴玉章老校长”带领下共同朗诵毛泽东同志1937年为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所做的题词，全场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在剧终演员谢幕环节，扮演剧中主要人物的卫立国等

4名同学来到嘉宾席，向吴老的孙辈吴本立、吴本渊、吴本浔、吴本蓉献上鲜花，表达对吴老崇高的敬意和深切怀念。

演出结束后，观演领导与吴老家人一起亲切慰问演员并合影留念。吴老的孙女、信息学院吴本立教授表示演出非常精彩和感人，对学校领导重视支持创作排演话剧表示衷心感谢，对演员同学精彩表演表示充分认可和鼓励，并希望通过话剧《吴玉章》让广大师生进一步了解吴老，学习和传承吴老“一辈子做好事”的优秀品质。

靳诺对演出成功表示祝贺，向编创、演职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对话剧《吴玉章》给予高度肯定与评价。她指出，《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独有的一部剧，吴玉章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崇高地位和传奇经历为中国所独有，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开拓者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所独有，话剧既描绘了吴老筹备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的辉煌剪影，也是全体人大人“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精神面貌的体现，对于学校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有积极意义，对于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打磨、完善、传播好这部话剧，将其打造为人大师生、校友认同的经典剧目，充分发挥校园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功能，使话剧成为每一届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一课。

话剧《吴玉章》作为80周年校庆的重点活动于今年年初开始启动，校团委指导学生艺术团在大量阅读史料、实地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根据吴老真实经历创作了剧本初稿，后又在学校领导指导下结合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建议进行多轮修改，七易其稿形成最终剧本。学校领导对创排高度重视，靳诺审阅剧本并批示修改建议，刘伟审看剧本并关心指导。张建明、洪大用、郑水泉多次召开协调会、讨论会进行剧本研讨，前后3次审看话剧彩排联排并指导进行修改完善。吴付来观看话剧联排并提出意见建

议。话剧《吴玉章》还得到了有关专家顾问的指导帮助，黄达教授以92岁高龄亲自批阅剧本，就相关史实提出修改建议，戴逸教授鼓励学生艺术团排演好吴老主题话剧，吴老行政秘书王宗伯遗孀钱韵老师、四川吴玉章纪念馆馆长吕远红均对话剧创排提供了大力指导帮助。学生艺术团话剧团全体同学从7月6日正式进入排练周期，牺牲暑假时间、克服高温酷暑，每天排练十几小时，力求完美表现人物，实现舞台最佳效果。可以说，话剧《吴玉章》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学校领导、老师、学生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的成果。

师生代表观演后反响强烈，纷纷表示话剧《吴玉章》主题鲜明、立意深远、故事感人，通过话剧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进一步激发作为人大人的自豪感、使命感与荣誉感，新的历史时期仍需要学习继承吴老教育思想和崇高品行，不忘初心，为早日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观演师生们一致认为，话剧《吴玉章》是80周年校庆带给全校师生、校友的一份惊喜礼物，并对后续的校庆系列活动充满了期待。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總統晴談八系設研修設專備設區授
 有良師有賢才有英模有工農新中國
 新大學立學為民治學報國煥彩人文
 霞蔚聚力風氣雲起一夕雲湧文華
 內亂斯文不堪回首八百鴻儒余江整
 耨赤子猶存壯心戊午華年雲銷雨霽
 頁下起元回枯為榮故地新篇絳帳復
 開非復原劫後重聚光陰惜寸又惜分
 同門切磋琢磨磨礱臺研精靜慮才俊學
 子爭朝夕真理標準討論東風滿眼春
 未陳出校友建茂功十五系六研研芝
 蘭齊芳德智雙菁焚膏繼晷為索真知
 中且達夕以求修能四座秉燭輝熠咫
 尺書齋三更聞鷄朗然千畝學庭 放
 歌新世紀孜孜復孜孜極日新邇遠行
 行重行行大樓大師望西山而文脈綿
 亘大學大道寰中闢而閭中取靜玉章
 路接天壯志廣績憂樂襟懷鍛鑄國民
 表率明德樓暎日魂瞻嚴樞體用精要
 砥礪社會棟樑百家廊簷飛七曜柱立
 八荒起古今正氣匯中外學術一勺池
 氣吞三江文澤五湖做津樑學問撰海
 觀文章蒼聯授業黃鬚日覽手披盈窗
 翰墨先學提攜後生心移神注滿園清
 芬玉蘭飛白銀杏燦黃環簇校訓石之
 巍然寄事求是四字頂天立地一語貫
 古通今 八秩春秋易逝不忘初心來
 路窈洞出馬列實踐出真知與祖國同
 生偕中華圓夢斯校也書聲伴礪聲興
 學弦歌和凱調傳承斯學也理論與實
 際齊輝資政共育人並闡登高臨遠範
 水模山催發桃李萬樹人民滿意世界
 一派敢攀教育巔峯

賀中國人民大學八十華誕
 李東東撰於丁酉初夏 盧中南書

迎接人民大學八十華誕

《人民大學賦》捐贈儀式在京舉行

為迎接中國人民大學80周年校慶，9月7日，《人民大學賦》捐贈儀式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樓舉行。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全國政協委員、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理事長李東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館員、著名書法家盧中南，人民大學常務副書記張建明、副校長賀耀敏、副書記鄭水泉，以及學校師生代表共同出席了活動。

《人民大學賦》由李東東撰寫，盧中南為之進行了書法藝術創作。活動中，李東東、盧中南向人民大學捐贈了賦作與書法作品，靳諾、張建明代表學校接受捐贈，並向兩位作者頒發捐贈證書；靳諾、李東東、盧中南、張建明、賀耀敏向與會師生代表贈送了經折裝《人民大學賦》。



人民大學賦

歲逢丁酉時維夏仲仰蒼穹東烏西兔
 日升月恒俯衝壕南疆北地風起雲湧
 中國人民大學欣逢華誕煌煌矣八十
 載征程無邊勝迹曠古豪情 嘗憶疆
 膏侵掠世紀滄桑忍顧生靈塗炭華夏
 枯榮歲次辛未遼東泣血歲次丁丑靈
 溝蒙塵華北之大難容一張書標洛川
 會議高擎十大緞領赤縣神州獵獵四
 方風勁寶塔延水莽奏八面津通伴九
 曲黃河引萬眾俊彥清涼山下設庠陝
 北公學肇創授莘從戎書生效精忠報
 國集螢映雪青春寄圖存救亡先生五
 十明道解感後學六千卧薪枕戈一燈
 如豆百川在胸規成燎原星火亦學上
 兵亦教亦耕造就革命先鋒松柏翠山
 丹紅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 千回
 百轉奮楫十載遊擊辦學馬背馳騁華
 北聯大砥柱中流師生戮力家國干城
 三個法寶統帥股肱教誨一面錦旗勇
 士浩浩出征畢業赴戎虜戰鬥上前綫
 燈火萬家憂樂肝膽一腔赤誠餐風宿
 草成就英雄事業飲露披霜抒寫歷史
 奇迹丁亥孟秋華北大學矗屹蒸越繼
 圭臬孚新學四部兩院育骨幹二萬學
 子歌大風民族希望河山坻冶龍虎社
 稷擔當歲月拂沐崢嶸 發軔延安輾
 轉散後葉基正定趕考北平歲次己丑
 序屬季春柳嫩花繁水碧山青暮消殘
 雪而西峯黛朝迎旭日而東方紅杏壇
 再設建人民大學出之以宏旨層樓又
 上辦建國教育成之以使命青甃未開
 鐵獅子雄踞風雨平時闢野雙榆樹吐



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向李東東、盧中南頒授捐贈證書



人民大学领导和李东东、卢中南委员向与会
师生代表赠送经折装《人民大学赋》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陕北公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生，历经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一路走来，形成了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三大办学特色，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李东东怀着礼敬之心应邀为人民大学写赋，与人民大学领导、专家学者多次沟通交流，认真了解校史，详细查证资料，精心谋篇布局，反复锻字炼句，以煌煌之文，饱蘸浓情，回溯历史，遥寄未来。赋作共 962 字，凡七段，以历

史发展为脉络，描述了陕北公学在延安的创立，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敌后办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文革”停办与十年浩劫后的复校，以及新的历史阶段努力创办“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

著名书法家卢中南应邀书写《人民大学赋》，他以端庄工整、潇洒俊逸的书法艺术，将赋作以最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形式加以呈现，实现了“书文互成、文墨相生”，使赋作的表现形式提升到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

在高校出版社排名前列、处在国家出版事业的第一方阵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仅用一周时间便将《人民大学赋》



编辑、设计成文气典雅的经折装书法册页形式出版，使这一展现人民大学责任担当的“文墨双璧”流传于世。

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讲话中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人民大学正在向实现“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迈进，这个过程中需要提振精神。《人民大学赋》钩沉史迹、提炼精神、书写艰辛、赞颂功绩，是对人民大学办学特色和人大精神的重要诠释。李东东理事长创作、卢中南书写《人民大学赋》，倾注心血，态度严谨，追求卓越，令人感动，代表人民大学教职工和广大校友表示感谢。

人民大学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在致辞中说，在喜迎建校80周年之际，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新型高等教育的历程，总结人民大学的办学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在80年的奋斗历程中，人民大学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大使命，积淀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与深厚的精神财富。李东东理事长创作的《人民大学赋》，架构宏伟，气势磅礴，既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又深刻地阐释了人民大学精神气韵的内涵与外延。由卢中南委员书写的《人民大学赋》，笔法端庄，富于张力，将人民大学的精神内蕴于书法之上。《人民大学赋》的

文字与书写，是对人民大学办学历程的重要梳理，是对人民大学发展成就的重要总结，也是对人民大学重要精神的深刻诠释，必将广为传颂，传之久远。

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东东在发表感言时说：“创作《人民大学赋》，使自己得到一次关于党的教育工作的宝贵学习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沿着这一思路，靳诺书记和学校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与我一道，多次沟通交流、切磋琢磨，以历史发展为脉络，描述人民大学在不同时期的使命担当与辉煌成就。”

李东东对在创作中得到人民大学领导、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支持指导和鼓励表示诚挚感谢，并指出《人民大学赋》是学校领导、教师、干部、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努力的成果，凝聚着全体人大人的心血。从《人民大学赋》的赋文写作，到书法艺术再创作，到以精美出版物的形式进行传播，凝聚了教育、文化、出版工作者们的殷殷关切与团结协作，自己深深感悟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感铭砥砺前行的深情厚谊、感佩工匠精神的深耕厚植。

李东东说，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的喜庆氛围里，人民大学迎来80周年校庆，这是人民大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迈向未来的历史新起点。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在实现“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奋进过程中，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高等教育建设发展进程中再创辉煌，坚持立德树人，培养优秀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书法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卢中南在

感言中说，书写《人民大学赋》是自己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能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能为迎接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感到非常荣幸。

据悉，《人民大学赋》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经折装书法册页形式出版发行，将作为祝贺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独特文化载体，于10月3日校庆时赠送给广大师生、校友和嘉宾。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靳诺、李东东、卢中南等同志与人民大学青年学子在《人民大学赋》书法作品前合影留念

《人民大学赋》 ——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作

李东东

“

李东东，女，汉族，籍贯河北徐水，生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专业毕业，法学硕士，高级编辑，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历任经济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特刊部主任，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

先后撰写了《张家界赋》《宁夏赋》《中共中央党校小赋》《北戴河赋》《八一赋》《清华赋》《军事外交赋》《故宫人颂》等辞赋，在社会上广为传颂，有相当的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



2017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建校80周年。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

大学一路走来，形成了“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三大办学特色，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立学为民，治学报国；资政育人，不忘初心；桃李天下，硕果卓然。丁酉鸡年，闻鸡起舞，孜孜砥砺前行，谨撰赋文礼赞人大精神，并贺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华诞。

岁逢丁酉，时维夏仲。仰苍穹，东乌西兔，日升月恒；俯衢壤，南疆北地，风起云涌。中国人民大学欣逢华诞，煌煌矣八十载征程，无边胜迹，旷古豪情。

尝忆强虏侵掠，世纪沧桑；忍顾生灵涂炭，华夏枯荣。岁次辛未，辽东泣血；岁次丁丑，卢沟蒙尘。华北之大，难容一张书桌；洛川会议，高擎十大纲领。赤县神州，猎猎四方风劲；宝塔延水，莽莽八面津通。伴九曲黄河，引万众俊彦，清凉山下设庠，陕北公学肇创。投笔从戎，书生效精忠报国；集萤映雪，青春寄图存救亡。先生五十，明道解惑；后学六千，卧薪枕戈。一灯如豆，百川在胸，势成燎原星火；亦学亦兵，亦教

亦耕，造就革命先锋。松柏翠，山丹红，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千回百转，奋楫十载，游击办学，马背驰骋。华北联大砥柱中流，师生戮力家国干城。三个法宝，统帅殷殷教诲；一面锦旗，勇士浩浩出征。毕业赴戎麾，战斗上前线，灯火万家忧乐，肝胆一腔赤诚。餐风宿草，成就英雄事业；饮露披霜，抒写历史奇迹。丁亥孟秋，华北大 学矗屹燕赵，继圭臬，孕新学，四部两院育骨干，二万学子歌大风。民族希望，河山坏冶龙虎；社稷担当，岁月栉沐峥嵘。

发轫延安，辗转敌后，筑基正定，赶考北平。岁次己丑，序属季春，柳嫩花繁，水碧山青。暮消残雪而西峰黛，朝迎旭日而东方红。杏坛再设，建人民大学，出之以宏旨；层楼又上，办建国教育，成之以使命。青甃朱门，铁狮子雄踞风雨；平畴阔野，双榆树吐绽阴晴。



设八系，设研修，设专修，设函授；有良师，有贤才，有英模，有工农。新中国，新大学，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焕彩人文霞蔚，聚力风气云凝。

一夕雾雾，“文革”内乱，斯文不堪回首；八百鸿儒，余江垦耨，赤子犹存壮心。戊午华年，云销雨霁，贞下起元，回枯为荣。故地新篇，绛帐复开非复原；劫后重聚，光阴惜寸又惜分。同门切磋琢磨，兰台研精静虑，才俊学子争朝夕；真理标准讨论，东风满眼春来，杰出校友建茂功。十五系，六研所，芝兰齐芳，德智双菁。焚膏继晷为索真知，申旦达夕以求修能。四座秉烛，烨熠咫尺书斋；三更闻鸡，朗然千亩学庭。

放歌新世纪，孜孜复孜孜；极目新邦途，行行重行行。大楼大师，望西山而文脉绵亘；大学大道，处中关而闹中取静。玉章路，接天壮志，赓续忧乐襟

怀，锻铸国民表率；明德楼，映日魂胆，严楔体用精要，砥砺社会栋梁。百家廊，檐飞七曜，柱立八荒，凝古今正气，汇中外学术；一勺池，气吞三江，文泽五湖，做津梁学问，撰海岳文章。苍髯授业黄髻，目览手披，盈窗翰墨；先学提携后生，心移神注，满园清芬。玉兰飞白，银杏灿黄，环簇校训石之巍然——实事求是，四字顶天立地，一语贯古通今。

八秩春秋易逝，不忘初心来路。窑洞出马列，实践出真知。与祖国同生，偕中华圆梦。斯校也，书声伴炮声兴学，弦歌和凯歌传承。斯学也，理论与实际齐辉，资政共育人并闳。登高临远，范水模山，催发桃李万树；人民满意，世界一流，敢攀教育巅峰。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



吴玉章与新闻系学生在一起

吴玉章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他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于1966年病逝，享年88岁。吴玉章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他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得到了人民的爱戴。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这正是吴玉章一生的写照。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吴玉章少年时期就立志将来要“做点有益于人有有益于国的事情”。而他一生中所铺就的革命之路，的确不负此崇高理想。

吴玉章是革命的拥护者、宣传者和实践者。1903年他浮槎东渡留学日本，后来不仅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了《四川》杂志，还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吴玉章投身革命，组织共进会，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策应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在辛亥革命中，吴玉章坚定地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工



作。吴玉章还参加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通缉。吴玉章在1913年流亡法国，到巴黎法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又在北京、四川等地继续着革命的斗争。

在走过曲折的道路后，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的浩然气节从未被革命的艰险所磨灭。在曾家岩50号我党的一次会议中，吴玉章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想窃听会议内容。果然，一个国民党特务军官探头进来。吴玉章愤怒地斥责：“我斗争了几十年，什么人没见过！不要说一些小特务，你们的孙元良、蒋介石，我也要当面训斥他！”几句话使得那军官无地自容，红着脖子缩头下楼走了。

吴玉章革命立场坚定。1938年4月，吴玉章从欧洲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奉命前往国统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年年底，在国民参政会后，蒋介石趁机拉拢吴玉章，两次利诱他回国民党作强有力骨干。吴玉章斩钉截铁地回应：“我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决不动摇，决不会二三其德！”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

吴玉章为革命牺牲了小我。在悼其亡妻游丙莲时，他以悲痛绝然的笔触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

华民族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以慰你在天之灵。”回顾前半生峥嵘岁月，吴玉章深知，于己于国，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也毕生坚持着这一选择。

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

吴玉章在史学方面深有造诣，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吴玉章于三十年代到苏联东方大学任教，编成《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作为教材。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中国历史教程》属于唯物史观学派少数拓荒性的著作之一。吴玉章还以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成了《论辛亥革命》《历史文集》等历史论著。吴玉章以历史发展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作为自己治史的原则思想。他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来代替历史叙述。”他所强调的这一原则影响很大，范文澜即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了他最主要的学术观点“西周封建论”中。吴玉章还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指导，在指导思想、史料选用、编辑体

裁上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筹划和领导了史学界许多重要活动，为发展中国历史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已经年逾八十的吴玉章在主持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说：“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能偷懒和取巧的。”吴玉章对史学的关注和热爱一直未消减。

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文字

改革是吴玉章毕生从事的革命与教育事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31年在苏联任教期间，他就与瞿秋白等人一起探讨文字改革问题，从《中国拉丁化字母》开始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初步尝试，并帮助旅苏的十万华工进行文字扫盲。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召开。会后短短几年时间，全国范围内就兴起了新文字运动的热潮。吴玉章曾任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他回到延安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利用新文字进行扫盲，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他创办《新文字报》《新文字丛书》等书刊，并把过去的研究成果整理为《新文化和新文字运动》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直接领导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主任。他大力推广简化字，制定普通话标准，身体力行地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教学。在他的努力下，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在群众中得以试教、试学、试用，逐步推行了起来。吴玉章始终把普及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作为文字改革的目标。“我已经八十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为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它奋斗到底。”吴玉章在1958年全国政协上作报告时说。这样厚重温暖的胸怀，来自身为文人的担当，更来自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爱。

用心办好人民的教育

吴玉章一生办学，把教育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早年参加和组织了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担任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重庆中法大学校长；抗战时期，吴玉章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北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吴玉章被任命为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吴玉章四处奔波，多方联系，解决校舍等硬件问题。他带领教师、干部边干边学、初步建立了一支能担负行政后勤和教学工作



的教工队伍。在紧张筹备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50年10月3日正式开学，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

在招生问题上，吴玉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工农开门。吴玉章对这些学员十分关心，组织学校为其设计教学方案，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使工农学员都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吴玉章从始至终都正确地贯彻着党的教育方针。他主张办学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要求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便完成“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的任务”。

吴玉章一向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为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吴玉章经常组织试讲，他也经常亲自讲课，并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意见。吴玉章主张教学相长，为人大培养了师生间密切联系、相互尊重学习的优良风气。

吴玉章坚持从严办学，为学校制定周密的计划，尤其注重教学计划的准确与详实。他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不允许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一次，一位教师来上课时迟到了五分钟，随即受到了全校指名通报批评。他严正道：“教师上课要准时到课堂，这正如学校要求学生准时上课一样，如果都可以随便迟到或不上课，这个学校就办不好了。”人大严谨的学风是与吴玉章校

长的言传身教断然不可分的。

在五六十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浪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在吴玉章的主持下仍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即使在“左”的错误严重冲击下，依然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大批教师。在1960年8月下旬一次批判教师的会议上，当时已82岁高龄的吴玉章亲自到场，虽体力难支，却整整在会场听了半天。会后他沉痛地说：“不能这样批判同志嘛！”吴玉章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尽力地保护人大的教师。思及吴玉章的爱护，许多教师和学者都怀着一份厚重的感激。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时间长达17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近50万人。他所创立的适合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得中国人民大学迅速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吴玉章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使命，也为人大奠定了宏伟的基业。

吴玉章曾写下这样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丝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是他对自已一生的高度概括，也足以使人铭记他为党为人民无悔而伟大的奉献。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本文由隋昕根据相关书目编辑整理而成）

郭影秋：众人眼底自成碑

“

郭影秋（1909 - 1985），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他从抗日战争初期起，历任党、政、军各部门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自1957年转入教育部门后，先后在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不忘读书治学，学习理论，研究文史，并有著述传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代表，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终其一生，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北地结长纆，戎马事南征

郭影秋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作为家中好几代人中唯一的读书人，他十分勤奋，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短短几年熟读四书五经，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十三四岁时，郭影秋已不满足于在私塾里读“子曰”“诗云”，

他远赴大彭（今徐州市）市立一小读高小。“忆昔远读书，干粮百里送。饼霉难人唇，饭稀如照镜。”他回忆这段经历时曾作此诗。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郭影秋求学之路从未平坦。1929年初，他正在县立铜山师范读书时，国民党为安插党羽篡



夺学校的领导权，策划了驱逐原校长的学潮。作为校学生会主席的郭影秋，拒绝了国民党对他的拉拢和诱惑，被排挤离开铜师。同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却由于交不起学费，又中途辍学。1930年秋，他考取了公费的江苏教育学院。在学院里，他目睹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于是开始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他大量阅读进步书籍，还秘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憧憬和追求。“九一八”事变后，郭影秋领导了江苏教育学院学生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活动。为此，校方曾要对他以开除学籍论处，后在进步教授的声援保护下，才免遭处分。

1935年，经苏鲁豫特委考察，郭影秋被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敌人开展秘密斗争。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搜捕，6月11日，郭影秋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甚至被敌人折磨得昏死过去，仍作诗言“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其狱中斗争的思想和情操。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郭影秋受党组织委派，到第五战区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民众发动工作，为该地区培训了大批抗日骨干。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他又按党的指示，走向农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革命武装，为创建和开辟湖西地区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湖西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时候，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湖西肃托事件”。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郭影秋也被诬指为托派，险些遭到枪杀。在事件被制止后，郭影秋从高度的党性原则出发，顾全大局，继续英勇战斗在湖西地区。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物质条件极为艰苦，郭影秋以身作则，克己奉公，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不断巩固湖西根据地抗日力量，并领导军民反攻，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

战争年代的郭影秋是一位才能超群的湖西儒将。八年浴血奋战转入解放战争后，郭影秋参与领导了解放与防卫济宁的战斗；亲率三千子弟兵重返湖西，收复了一度失陷的根据地；与解放军野战部队密切配合，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初，他率队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转战于安徽、江苏和西南各地，为解放全中国、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德才兼备的良师益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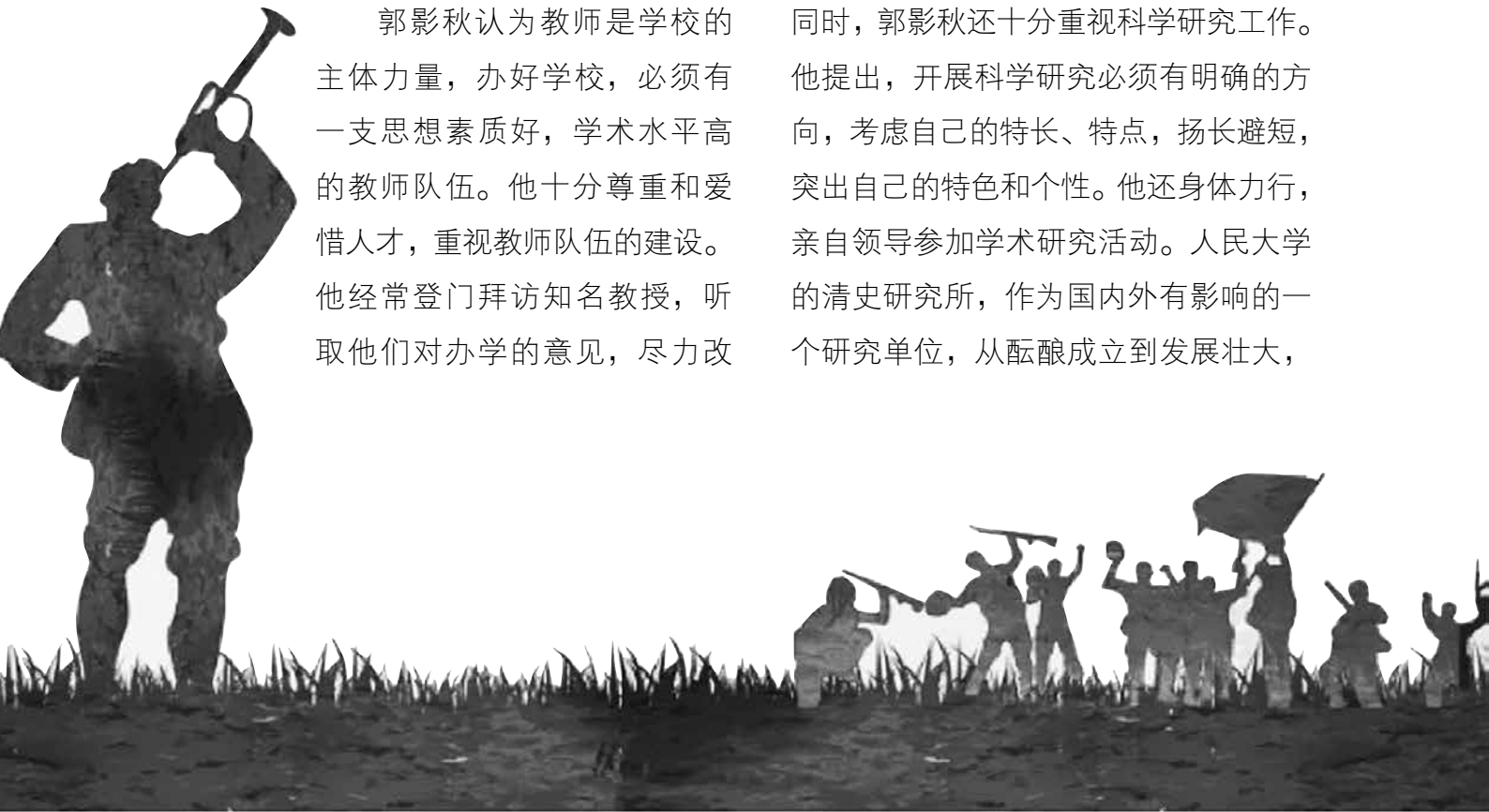
1957年，时任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

主动请缨到教育部门工作，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大学，我认为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假若让我学习两年，我就可以去办个大学。”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里写道。1963年初，周恩来总理拟调郭影秋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恰在此时，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急请周总理派遣一位得力助手。中央经慎重研究后，决定让郭影秋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协助吴老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1963年到1985年共22年里，郭影秋付出全部心血，带领中国人民大学不断探索前行。

郭影秋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力量，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支思想素质好，学术水平高的教师队伍。他十分尊重和爱惜人才，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经常登门拜访知名教授，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尽力改

善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他曾经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中文系三位学术造诣深、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做寿，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使老教师们深受感动、难以忘怀。他同时鼓励青年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很多年轻教师得以较快地成长为学术接班人和学科带头人。

郭影秋懂得教育，了解办学规律，有明确的教育思想。他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切实抓好教学的各个环节，他到教研室蹲点，同老师一起讨论教学方面的问题；他经常到课堂听课，有时还参加学生的晚自习和课堂讨论。在抓教学的同时，郭影秋还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提出，开展科学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方向，考虑自己的特长、特点，扬长避短，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他还身体力行，亲自领导参加学术研究活动。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作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一个研究单位，从酝酿成立到发展壮大，





1964年，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欢迎学军归来的师生

都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曾亲自兼任该所的前身——清史研究小组组长，指导帮助该所明确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步骤，参加学术讨论等。可以说，人民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复校之初也取得了较大发展，这都与郭影秋以教学为中心、重视科学研究密切相关。

郭影秋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杰出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他优秀的品质和作风给人民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交口称赞他是“德才兼备的好校长”“兼资文武的良师益友”。

学者风范、文人风骨

郭影秋不仅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还是一位学有专攻、造诣颇深的历史学家和诗人。其研究工作及研究思想是其革命思想、教育思想的延伸和表现，其学者风范、文人风骨更是其崇高的革命思想的一部分。

郭影秋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以丰富翔实的史实，记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的一生，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史料性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21万字，引用的资料达100多种。他在序言中说：“学术工作是严肃的，没有科学的、严肃的态度是不会做到预期的结果的”。该书虽然是一部史料性专著，但绝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整理编排。通过《李定国纪年》，我们可以看到郭影秋独到的治史特点、治史方法与史学眼光。他以宏观的政治与学术视野为背景，以高度的历史概括与凝重的语言提炼，史论结合、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写下著作，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郭影秋的文武全才、知识渊博，还体现在他深谙诗词艺术的格律与意境。他的诗词独具个性，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但他在一封谈诗的信中却谦虚地说：“我对自己的诗几乎没有几篇满意的。不唐不宋，不今不古，不性灵也不格调，不喜用典但有时又不能不用，可以说是一片杂烩。”其实，这正是他的诗博采众长、另辟蹊径之处。

郭影秋诗词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豪情激荡，正气凛然。譬如1936年郭影秋被囚徐州监狱，受到非人待遇并被严刑拷打，他曾作诗云：“连年提剑觅仇雠，身陷囹圄恨未休。打掉门牙肚里咽，

英雄宁死不低头。”

这首诗使典雅与口语化的语言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而“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与先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取义成仁今日事”等古今同调，异曲同工，都是惊天动地的正气歌。

郭影秋的诗词豪放中有婉约，不论是豪气磅礴的战斗篇什，还是缠绵悱恻的抒情小品，无不是他喜怒哀乐的真实流露。他的诗里既有叱咤风云的战斗岁月，“挥戈誓达男儿愿，报国犹存壮士头”；也有保家卫国的壮烈，“荒丘埋骨知谁似，壮士悲歌若耳闻”，哀思亲如手足的战友；还有诸如“卅年攻错我犹辟，两地相思鬓易霜”等诗句吐露出娓娓动人的情怀。

读其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人心生对其高尚风范的敬重。

郭影秋的一位学生献给他一副挽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马列灵前应无憾；三寸丹心，百磨筋骨，众人眼底自成碑。”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教育家、造诣颇深的学者和才华横溢的诗人，郭影秋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本文由刘宜卫、陈轩超根据相关书目编辑整理而成）



■ 成仿吾：在党的教育事业的“长征”

“

成仿吾（1897—1984），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10年东渡日本，先后在名古屋第五中学、冈山第三高等学校二部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7月底，成仿吾担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7月，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1949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协助吴玉章工作。1953年以后，他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春，成仿吾受命主持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任党委书记、校长。

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

成仿吾早年受国富强兵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兵器制造工程。留学期间，成仿吾深感革命文艺对启迪国民觉醒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

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在这期间，成仿吾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小说、诗歌，对启迪人民的思想、向封建愚昧进军、推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他在《从革命文学到文学革命》《全部批判之必要》等文艺批评文

章中，已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

1924年，成仿吾受聘任广东大学理学院力学教授兼德语教授。1928年，成仿吾前往欧洲，在那里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回国后，他在鄂豫皖和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直接投身于艰苦的革命洪流之中，锻炼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1934年10月，成仿吾担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同行，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长征。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和马列经典书籍的挂包，这位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就这样和每一个普通红军士兵一样，踏上了漫漫征程。

飞机场上的教育史奇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那些急切地寻找抗日救国方法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成批成批地奔向延安，他们把延安看作照亮中国抗日救国的一座灯塔。为了把这些来到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并吸引更多的人以壮大革命队伍，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被任命为陕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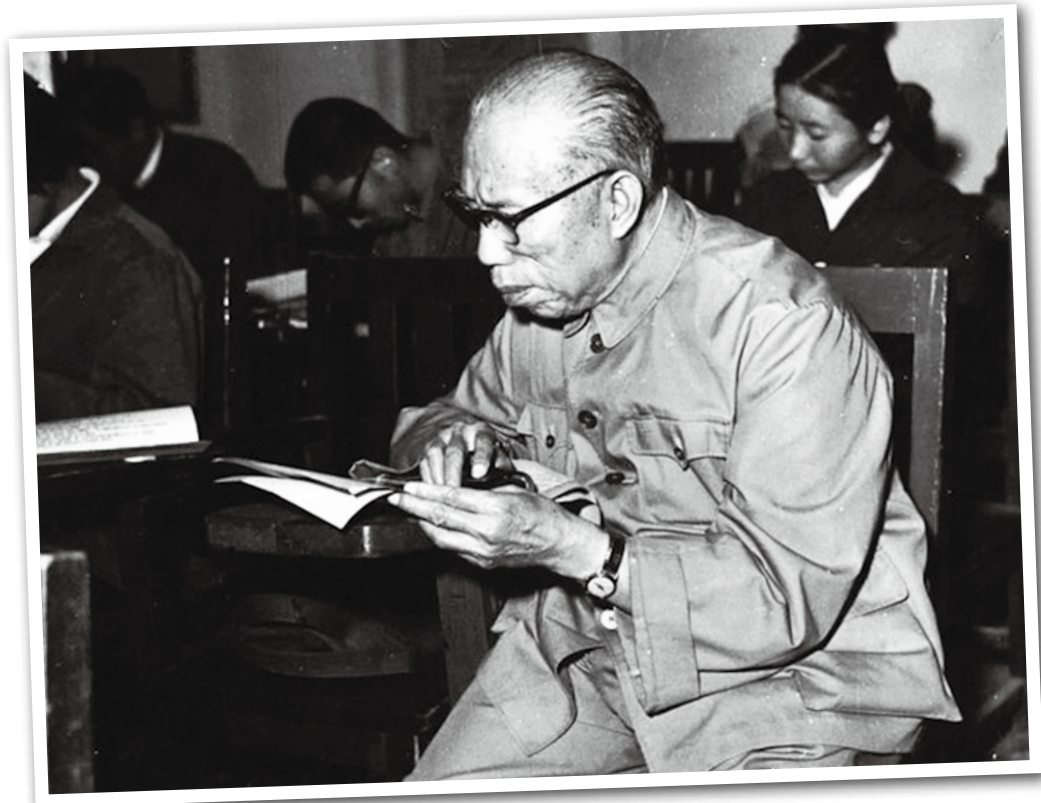
公学校长兼党团书记。

“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成仿吾在回忆艰苦创校的历史时说。陕北公学校址设在延河之滨的飞机场，原是汽车训练班用的一些平房。成立之初只有十几名干部，成仿吾就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和领导陕北公学，肩负起为抗日战争壮大力量的重任。

成仿吾领导陕北公学，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方针，创造了一整套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准则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计划与教学措施，取得显著成绩。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入党。他们被分配到各个抗日前线去，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那样短的时间内，造就出这么多优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

1939年春、夏两季，日军增兵华北，



1979年成仿吾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课堂听课

妄图渡过黄河进攻陕北。党中央经过会议决定让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其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一起开赴敌后，坚持在华北抗战，并开展国防教育。

“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成仿吾曾回忆说。

考虑到身处敌后，经常有日军的扫

荡和围剿，成仿吾立即采取新的措施。当他们踏过胭脂河上的薄冰，靠近较为平静的边区的西南部时，成仿吾提出了“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白天，行军休息时，学生们就聚集在隐蔽的树林里上课；晚上，睡觉前，学生们就热烈地进行讨论。“哲学概论”“音乐概论”“戏剧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就是在边行军边学习的战斗生活中学完的。就这样，学生们在行军过程中依然完成了重要课程的学习，而且学得扎实，学得生动。这一学

习方式也为敌后教育开辟了新途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英雄事业，成仿吾等共产党人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1941年八九月间，日寇集中七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中心腹地阜平、平山地区“扫荡”，华北联大被迫停止集中教学，化整为零，转移到山区，在群众掩护下，分散住在小山村里。敌人迫近时，就躲到山洞里。尽管生活十分艰苦，还不时有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乱投炸弹，成仿吾心中始终装着全校师生，经常骑着马到各个村庄去看望教师和学生。有的点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要走到，给大家发银元，付给老乡生活费。有的学生当时见到成校长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顷刻间像看见亲人一样痛哭起来。成老带给学生鼓励和关怀，告诉大家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师生坚持反“扫荡”的斗志和努力学习的热情。

“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

1949年12月1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任命吴玉章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由胡锡奎和成仿吾同志担任副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的过程中，成仿吾显示出作为一位杰出的

无产阶级教育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造性和坚定性，对办学中面临各种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上，政务院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成仿吾反复强调，学习苏联要避免生搬硬套的弊病：“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目的，必须加强人民大学与各企业部门的联系，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起来。”那时，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成仿吾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理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仿吾坚持的观点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是富有创造性的。

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时，成仿吾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迅速掌握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与管理条例，他开始努力学习俄文，以便直接阅读苏联有关文献。他译校了不少学校的条例，比如现在全国通用的“教研室”这个名词，就是经过他反复考虑翻译确定下来的。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建立起了41个教研室，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探索。在中



国人民大学的经验启示下，全国高等学校纷纷成立了教研室，这是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科学管理的一大成果。

复校不是简单的复原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复校，成仿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已是八十高龄的成仿吾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把分散到各单位的设备、物资找回来，把流落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教师找回来。他英姿焕发、全身心地投入，让不少干部和教师敬佩道：“成老不怕困难、征服困难的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丝毫未减当年。”

“恢复绝不是简单的复原！”在7月26日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会师大会上，成仿吾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总设计师，他对整顿、复校工作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恢复整顿，树立骨架，建立保证教学科研活动正常进行所必要的秩序；第二步，迅速向前发展，使中国人民大学在各方面都作出突出成绩，在较短时间内能较好地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新水平。

成仿吾是一位说得少、做得多的领导干部。他宣布了分两步走的计划以后，立刻抓紧落实，使纸上的东西成为了现

实。

开学后，成仿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教职员工解放思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在讨论会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并力求解决问题。1979年4月，成仿吾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为当时正在酝酿的经济管理体制变革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此后几年，成仿吾同志撰写了《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校译了《反社林论》，并主持了《成仿吾教育文选》的编辑工作，直至去世前夕，一直笔耕不辍。

成仿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教育工作时间最长的同志之一，他对党的教育事业具有十分浓厚的感情和非常执着的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本文由刘宜卫根据相关书目编辑整理而成）

学习三年 钟爱历史

王一帆

1953年至195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后统称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三年。当时我们学习的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俄文。这些课程我都没有接触过，都是陌生的，也是艰深的，这三年对我是启蒙也是奠定理论基础的学习。专业课是中国革命史。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和当时水平，把学习重点放在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学习历史使我扬眉吐气，也使我憎恨腐败，在爱恨交加中，有成长，有提高。以现在的水平来要求，当时的课程有许多偏颇和不足之处，可是历史的主流对我还是终身受益的。

学习历史使我自豪

我出生在东北的齐齐哈尔市，在我两岁的时候，这里就沦为日本统治的殖民地。从记事开始，一直以为自己是“满

洲国人”。父母这样告诉我的，周围的同学也都这样说。因为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就有“反满抗日”的嫌疑，就是犯罪。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日语”，而且日语的分量逐年加重，到小学六年级连算术课本都是日语的。我初中上的是天主教会办的私立女中，学的历史课，也不得不采用通行的课本，是《满洲国史》和《日本国史》，地理课本是满洲和日本地理。中国怎么样，中国在哪里一无所知，家里人认为我太小，不懂事，说出去会惹大麻烦的，也就从来没有给我透露半点信息。直到我上初中二年级，从一些禁书中，才逐渐得知自己原本是中国人。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日本投降后，我们正在上历史课，一个戴着少校军衔的苏联军官闯进我们教室，他会说中文，问我们秦始皇的主要功绩是什么？我们很多同学连秦始皇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少数人虽然知道这个人，但是主要功绩一点也回答不上来。站在一旁的老师，急得直摆手，只有一个学生回答是焚书坑儒。直到军官走后，老师告诉我们，秦始皇的最大功绩是统一中国。

齐齐哈尔市解放后，我读了半年高中，学习些皮毛，加入革命队伍，接受的主要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教育。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是满脑子空白，对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点也不懂。

进入大学后，在第一学期，就由孙家骧老师给我们讲中国通史，这浩繁的历史长卷，浓缩在不到50个课时里，可想而知，只能是简要而重点的讲授。孙老师善于言简意赅的表达和重点突出的讲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的灿烂文化，虽然学起来很深奥，也很难懂，但是中国先贤们的精辟思想，如可借鉴的治国理念，教育思想，为人处事的道德修养等，使我惊讶，使我叹服。从各朝各代的兴衰更替的规律中，体会到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亡等。尽管我学习的不够系统，也不全面，了解的也很浅薄，吸收的也有限，但是我仍然感到满足。为我今后不断地从中华悠久历史中吸收营养，打下基础。中国通史教我热爱文明古国，抛弃了“满洲国人”的怯懦、自卑、委琐的心理；换上了中国人的自信、自豪和振奋的精神面貌。中国历史在我心中，种下的是爱国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热爱祖国的理念油然而生且终生不变。



学习历史使我奋进

在第二学年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由郑昌淦老师讲解。开始时，对老师的南方口音不适应，后来才慢慢适应他的娓娓道来的讲课方式。我的最大收获是，对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有所了解，列强宰割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战争，中国都是以惨败告终，归根结底是清王朝腐败的必然结果。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我格外关注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觊觎。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把它毗邻的偌大中国当成他们掠夺的对象，在甲午战争时，就进攻过我东北旅大地区。

生在东北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对日本没有好感，又怕又恨。每当回忆在童年时期，在日寇铁蹄下过着屈辱的生活，这种情绪就自然出现。每天上学时，母亲都一再嘱咐，看见日本军警要躲得远远的。不仅我们小孩子怕日本宪兵，就是大人一看见身穿黄色军服，在左胳膊上戴一白色臂章，写宪兵字样的日本兵时，也是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因为他们看见谁不顺眼，就把人给抓起来或者是暴打一顿。说到打人，我头脑里立刻浮现出在小学时日本教师鞭打中国学生的情景。在小学教体育课的老师是一个叫青木日本人，每次上课，青木都拿着一根教鞭，看哪个学生不顺眼，照着脑

袋就抽打。有时把学生的脸都抽打得红肿起来，打的最多的是两个女生，每逢体育课，她俩都吓得瑟瑟发抖，作动作人都发僵，挨打最多，后来她俩都转到另外一个学校了。在青木眼中，中国学生各个愚蠢，总想借故折腾我们，辱骂不解恨就打，似乎这样他才开心。我们背地里给他起外号，叫他“四眼鬼”，因为他戴一副近视镜。

读初中二年级时，教音乐课的是一个叫平山的日本老师，有四五十岁的样子，脸上擦一层厚厚的白粉，涂一个鲜红的嘴唇，我们给她起个“老妖婆”的外号。一次，下课铃声早已响过，她就是不下课，一个刘姓同学，悄声说了一句“下课了”。平山大怒，不依不饶，非要找出说这句话的人。大家谁也不说，闹到校长办公室，班主任亲自出马，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轮番询问，还是没有结果，很晚才放我们回家。第二天连课也不上了，继续追问，没有结果，校长就私下做工作，刘姓同学只好站出来，承认是自己说的。最后她被记大过处分，平山才罢休。中国学生，在他们眼里，是下等人，必须听话，不能有丝毫的违抗。

我的姐夫，为了家里老人生病，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10斤大米，结果被



判处为经济犯，关押一年多。院内一个张姓理发员，被抓去到边境做劳工，幸亏苏联红军来得快，把他解救出来。回到家，邻居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一个高大的青年人，回来已经像个骨瘦如柴的老者。

在日寇严酷的统治下，依旧有人出来反抗。不说那些抗日志士，我哥哥的一个伊姓同学，从北京读完大学回到故乡，进行反满抗日宣传，组织抗日团体，他后来虽然被日本人腰斩于新京（即长春），可是他的行动唤醒很多同胞。至今他的遗骸安葬在烈士陵园里，被后人景仰。

学习这段历史时，儿时的遭遇总是不断地闪回。我深深体会，国家羸弱，必然要受人欺侮和羞辱。失去祖国的庇护，就连人的任何权利都被剥夺，人的尊严更无从谈起。从近代史中，读到很多仁人志士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自己的祖国，后来者追寻他们的足迹，推翻封建皇朝的统治，赶走列强，驱逐日寇，恢复华夏之邦，使中国强大起来。

牢记历史教训

我的专业课是中国革命史，由胡华和彭明老师讲授。这两位老师，都是善于运用史料，生动具体阐述历史事件的

能手。从这段历史中感受到，以辛亥革命为起点，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为摆脱百年来的屈辱，为推翻封建势力而前仆后继。共产党诞生后，在国共合作中，消灭了独霸各方的军阀势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下，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大地。在中国朝着什么方向前进问题上，国共双方发生严重分歧，经过三年内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千疮百孔的旧中国被彻底改造，一个崭新的，有朝气的中国屹立在东方，新中国的成立，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在我们学习中国革命史时，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很多历史问题研究不深，并带有一些偏见。从今天看来，有不实之处，也有严重的缺陷。尽管如此，我从中得益最多就是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政党的领导；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政党，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奋斗；必须掌握武装，才能支撑下去和壮大起来。也使我懂得，要珍惜这段历史，这也是珍惜我们的今天，没有这段历史，走到今天的强国之路也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走到今天，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留给后人的是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经验与教训。

学习历史，给我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中国要强大，不能受人摆布和欺凌。中国的羸弱和受人欺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显著特征。用概括的语言表达就是一个乱字，有外乱，列强大肆宰割、瓜分中国；有内乱，军阀各据一方，相互争夺，相互厮杀。总之，外敌入侵、各方利益受损、政见分歧，是构成各方混战不已，兄弟阋墙的原因。现今的中国摆脱了落后贫困和积弱，强大起来。不断地解决走在富强之路出现的各种问题，朝着复兴强国之路前进之际，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最使我们警觉的是不能自毁长城。现实告诉我们，中东一些国家，由于民族、宗教和派别的分歧互相厮杀，结果是两败俱伤，国家的资源大肆破坏，人民生活在流离失所之中。

1992年1月29日，邓小平在深圳讲话，他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便是一片灾难。”邓小平深

知中国近代以来的“乱”及其灾难性的后果，更亲身体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乱”和苦难。所以对中国的乱的后果做出具体阐述。他说：“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落后，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往外跑”，“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又说：“一个国家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可以乱起来；但是寻求较长时间的稳定却需要花费很多心血、很多时间，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尤其是在今天，处于国内深水攻坚阶段，啃硬骨头，存在有“乱”的因素，如利益受损之辈不甘心失败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蠢蠢欲动，日本的安倍政府复活军国主义的所做所为，都向我们发出警示，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王一帆系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师）



学习继承发扬——读《人民日报》有感

李宗惠

日前，翻阅旧报刊时，突然读到1953年9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则题为“新学期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近8000学生到校上课”的报道。内容介绍：“九月一日正式上课那天，教师和学生们都提前到课。该校校长和各系、校部很多负责人都到各课堂检查和听课，学生们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教学秩序和效果都很好。学生们十分重视学校严格遵守纪律的优良传统。过去人民大学学生旷课比例仅万分之一，大家都以极大决心保持这一光荣。”同时，还讲到“在八月三十日，学校举行了开学动员大会。吴玉章校长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加速国家工业化建设中，中国人民大学负有重大责任。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完成党和国家交予的学习任务”，并且还报道了“开学的时候，校长和其他负责人格外关心学生的健康，都到学生食堂、宿舍检查大家饮食和居住情况。老同学们热烈欢迎新同学，

主动照顾他们，向他们介绍学校情况，介绍学习经验，充分表现出友爱团结的精神。这则报道中还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所设置的科系情况。

《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情况，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高度重视和抱有的殷切期盼，同时也是对我校办学的肯定。从报道中可以看出我校上自校长，下至职工、老师、同学都认真工作，认真教学，认真学习。其中，有一个数字，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学生的旷课比例仅是万分之一。学生人数当时只有八千，万分之一，按人数说还不是一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无人旷课，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万分之一”也是万一。万一意味着只是极其特殊，极其偶然的出现。正如报道所讲，这是我们学校“学生们十分重视学校严格遵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学生之所以如此精神饱满，因为他们深知党和国家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学



习。掌握了知识技能才有本领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吴玉章校长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完成党和国家交予的学习任务”，是的，全校上上下下，认识明确，目标一致，保证教学是学校的最根本、最现实的任务。这是一种担当，这是一种责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干部会努力工作，一个没有责任心的教师会认真教学，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学生会全心全意地去学习。责任高于一切，人人都牢记在心中。

后一段报道，学生自身努力学习，“学校格外关心学生们的健康”，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难以保证完成党和国家所交予的学习任务，将来也很难承担国家建设者的任务。当时有一句口号，“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 50 年”，学习好，身体好，这两点很重要。要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只有知识技能是不够的。反过来说，没

有知识技能，只有四肢发达的身体也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的报道，肯定了我校很多优良的校风，也就是我校的优良传统。如领导工作深入到班级，深入到宿舍，深入到食堂；教职工恪守其职，认真工作；同学们精神饱满，认真学习，严格遵守纪律，全校充满了友好团结、积极向上的风气。身为当代的人大人，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学习、继承与发扬这种实实在在的优良传统。

值此喜迎校庆 80 周年之际，重新读一读《人民日报》半个世纪前的报道，依然热血沸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早日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辜负老一辈人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作者李宗惠系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



难忘的铁一号学习生活

陈智为

1957年8月下旬，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阔步走进了北京市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红色大门，开始了四年令人难忘的大学生活。

“铁一号”是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简称。历史上她有很多名称，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段祺瑞执政府。1946年为纪念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将张将军生前住过的铁狮子胡同改名为张自忠路。1950年10月3日，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开学典礼在此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张澜等国家领导参加，师生4000余人隆重庆祝。1957年9月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在这座青砖雕刻、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落，开始了四年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

一、经济实惠的学生食堂

入校后首先接触的问题是吃饭，“民以食为天”。我从东北辽宁农村县城首次来到北京，一切感到新奇。在辽宁平时主食是玉米、高粱，偶尔改善生活时

才能吃到大米和白面。到北京在人大学生食堂，天天可以吃到大米白面。学生食堂在铁一号东南角，几间平房，放十几张方桌，就餐时八人左右站在四周（当时没有座位）几大盘菜放在中间，每人文明礼让夹菜，几个大木桶放在过道中间，可以随意舀起。记得当时的副食是荤素搭配，既有肉、鸡、鱼类，也有各种蔬菜，我记得肉末豆腐、肉片黄豆、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花样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齐全，但吃起来却十分可口。每月伙食费12元左右，我享受助学金，每月均有节余购买学习生活用品。令人难忘的是学生食堂的炊事员师傅，热情服务，体贴入微，同学中如有病号总会有师傅及时送上一碗热腾腾的白面条。最近，我与同住静园职工宿舍的马仁清师傅聊天，谈起铁一号过往情景，感慨万千。他说，任牛宝师傅（当时炊事班长，同学们都亲切称呼他为牛保）前几天已经驾鹤西去，走完了他八十七年的路程。马师傅1933年出生，1951年到人民大学工作，1953年到铁一号学生食堂工作。

当时我们认识他只有 24 岁，风华正茂，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如今已是 84 岁高龄的老人，但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并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大儿子在美国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外语人才，二儿子在国内公务机关任职，子孙满堂，幸福满满。

二、因陋就简的体育课

铁一号因受场地限制，体育设施简陋，在宿舍区楼下只有两个篮球场地，夏天上游泳课只能步行二十多分钟到什刹海游泳池，冬天上滑冰课也要到什刹海简易冰场去练习。当时的体育课主要是田径（围着铁一号灰楼跑圈，练习长跑则是沿着马路跑向东单，或者向西跑至厂桥等地）、球类（主要是篮、排球）、体操等。我被推举为体育课代表负责与老师沟通。当时体育老师先后有王继勋、龚之禄、张德山、薛文智、白若延、王在武等。我与王继勋老师接触较多，当时他才 21 岁，刚刚从体育学院毕业，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受到同学好评。如今因我们同在人大静园区，偶尔见面，谈起往事感慨颇多。张德山老师负责教篮球课，据说 50 年代初，他曾代表国家青年篮球队去匈牙利参加过国际比赛。所以，当时的历史档案系男子篮球代表队在的指导下，有了很大进步，并在 1958 年校庆杯比赛中，战胜诸多强队，获得全校冠军。我是后卫队员。有了这个成绩，我获得了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

龚老师负责田径，他指导田径队在学校获得好成绩，比如我系王文侠在全校运动会上曾获女子组百米、二百米冠军，我系男子长跑队也多次在校运动会上获得五千米和万米冠军。我系女子排球队在薛文智和白若延老师指导下，多次获得铁一号地区（新闻系、语文系、报卡社）冠军。我班杨友秀、陈蔼兰二位同学便是主力队员之一。

三、分班学习的外语课

我们年级九十多人，三分之二是调干生，少数是高中生，因此外语基础薄弱，而我基础更差。按每人不同情况分成三个班：英文班、俄文普通班和高级班，我被分在俄语普通班。我班授课老师刘季华老师，当年只有二十多岁，刚从外语学院毕业来人大任教。她是四川人，细挑身材，长得很漂亮，我们都很喜欢她。从俄文字母教起，发音、单词、组句，循序渐进，刘老师对我们这些基础较差的调干生很耐心，不厌其烦地引导我们，使我们逐渐对俄文产生兴趣，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到大三时，换成了韩净老师，她也很年轻，比刘老师大两岁，长得白皙、秀美，吉林人。她就住在铁四号中央戏剧学院宿舍，她先生在戏剧学院工作，与欧阳予倩、田汉、曹禺等文艺界名流都很熟悉。韩老师教学认真，辅导得力，使我们俄语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毕业考试我获得“优秀”，如今韩老师也住在



人大静园区教师宿舍，除了天冷，我们能经常见面，韩老师参加书画社，画得一手好画。谈起往事，也是浮想联翩。

四、师资雄厚的历史课

也许是历史档案系缘故所以非常重视历史学等课的教学，不仅课时多，而且安排的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历史教研室当时归属历史档案系，该室主任尚钺教授，曾是享誉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为我们讲过中国古代史专题。他编著的《中国历史纲要》是我们的必读教材，他培养了王思治、韩大成等首届毕业生，他们都成为历史学教学的骨干。王思治老师为我们系统讲授《中国古代史》，深受同学们欢迎。慢条斯理的郑昌淦老师以及注重史料分析的孙芳铭老师讲课，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近代史》，我们有幸听到戴逸教授讲课，杨遵道、林敦奎老师也相继上课，后来后来荣升人大校长的李文海老师，当时为我们上过辅导课。对世界史教学也很重视，程秋原主任率领阮籍、顾学顺等老中青结合的队伍，为我们讲授内容丰富的世界史。顾老师刚从研究生毕业，仅仅大我五岁，平时与我们接触较多，毕业后同班校友聚会时常常打听顾老师近况。他住清华园，但前些年在人大校园内常能看到曾任历史系主任的他的身影，退休后偶尔遇到也会寒暄几句，回忆起铁一号上课时的情景，也是感慨颇多。

五、学习苏联的专业课

历史档案系在1952年设立专修科，1955年设置本科。在吴宝康系主任精心组织与领导下，由小到大，到1957年时已发展到具有师生300多人的规模。那时的专业课没有公开出版的教材，只有各个教研室老师们在学习苏联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自编油印教材。以我所在的档案学教研室为例，在赵践、陈兆禄、李毅等老教师带领下，自编自印《档案管理学》《档案公布学》等油印教材。如今在人大静园能经常见到的韩玉梅老师，当年在国家档案局担任俄文翻译，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经她主编的《苏联档案理论与实践》为档案学的充实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她18岁参加工作，如今已是85岁的老人了。还有为我们讲授《世界档案史》的王秉学老师，在我们大三时曾任班主任，现在他也住在人大静园区，如今已92岁，但他身体很好，对于担任我们班主任那一段的学习生活还记忆犹新。

“饮水思源”，四年的铁一号读书生活虽然短暂，但它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在迎来母校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培养与教育，祝愿母校永葆优良传统，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作者陈智为系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退休教师）

献礼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

齐庆才

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式地需要，党中央在1938年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学院、延安工人学院、延保堡站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于张家口；1948年8月24日，在河北省正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华北大学进北京后的1950年10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华北大学，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胡锡奎、成仿吾、聂真、李培芝、校党委书记闫子元。全校师生员工喜气洋洋，锣鼓喧天，在铁狮子胡同3号，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吴玉章校长主持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及大专院校领导来校祝贺并题词。刘少奇代表毛主席在会上说：

“这所大学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借鉴中国人

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樣子来办。”

1948年，我在正定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时，校部教育干事高庆永老师，分配我到校警卫队，专职负责吴玉章校长的安全保卫工作，1949年2月3日进北京后，由警卫班长的岗位，调到校党委书记闫子元办公室任服务员工作，五年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没有节假日休息时间。虽然如此，我没有后悔过。闫子元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官架子，关心下属，公而忘私的态度，尤其对待烈士女儿会勤，牺牲自己亲骨肉的利益，给我的人生做出了榜样。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诞生的。由于时代原因，没有系统地学习文化的机会。到了北京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校领导决定，必须及早地提高教职工的文化水平、理论知识，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此，人民大学学校领导决定，开办业大和业校。校党委书记闫子元，兼业大校长，总务



处鲍建章兼业校校长。业校的老师，都是在校大学教师。学员入学前，经初步测试，分成高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我的文化低，在初级班学语文、算术、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

人民大学领导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下决心不辜负领导给的宝贵机会，将童年失去的学文化的机会补上。在努力完成工作的基础上，用业余时间，尽心尽力地投入到学习各门课程中。在课堂上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保证不迟到、早退，更不旷课，认真听老师讲课，认真做老师留下的作业，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向领导汇报。

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叫“苏联专家在人大”。我写的这篇作文，闫书记看到了，他主动地改了两次。除了在文字上修改外，还加上了一些数字。语文老师看了以后，认为我的作文通顺，内容丰富，竟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宣读，并让全班同学向我学习。闫书记知道后，很高兴地对我说：“努力学习吧，你的前途很大。”闫书记说，中国人民大学在中苏友好同盟期间，我们称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人民大学教学都以苏联的教材教学为指导。苏联派到人民大学的专家，就有99人之多，人民大学的教学、课程、科研都照搬苏联的经验，作息时

间也照搬苏联，中午不休息，全校所有人员改为两顿饭。

一天上午，闫书记笑着对我说：“庆才，你把那个木箱子打开，箱子里装着三把手枪，是在和敌人打仗时，保存下来的。一支德国造的王八鲁子、一把手枪、一支小手枪（内有六发子弹），你挑一把。”我要了一把小手枪。冬天把小手枪装在棉衣口袋里，夏天插在腰带上。警卫班的队员看后，都很羡慕我。我自己也很神气。从此，闫书记出校门办事，都让我保卫他的安全。

据我观察，闫书记和妻子田雪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地方武装部队，老共产党员。一天晚上，闫书记心血来潮问我：“庆才，今年多大了。”我说：“21岁。”他又说，他的闺女在哈尔滨上军工大学，叫云开。让我给她写个信，联系联系，有好处。突如其来的问话，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如何答复，只好说：“云开在上大学，又是军工保密大学，是党培养的高级战线上，指挥官或军事制造尖端武器的军事专家。正在紧张地研究任务中，她学习任务紧，我帮助不了她，就不打扰她了。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文化和思想水平都比不上她。她的文化、政治、理论知识都比我高，她又是高干千金小姐，我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再说，我也不会写信，前进一步，都是误区。“写吧，



写好后，我给你改。”闫书记认真地对我说。

1950、1951年间，校党委书记闫子元代表校党委，向全校全体人员，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共同打击美帝国主义胜利消息的报告。

会后，闫书记问我，庆才，我的报告有错误吗？我说：“您的报告大家都爱听，您的报告语言生动、易懂、活泼、有趣、有风度，都讲大实话，逗的大家笑个不停……”

1950年下半年，我从校警卫班的岗位上调到闫书记办公室不久，跟闫书记从北京火车站坐火车到保定火车站下车，接他托给保定郊区老乡家暂时抚养的女儿会勤。

从保定火车站上火车，车上的座位坐满了人。我和闫书记轮流抱着会勤。会勤小

丫头初次坐火车，也可能是饿了，哭个不停。我当时21岁，也没有经验逗会勤高兴。

2014年5月18日，我访问了闫书记的大儿子闫会师。我问会师，会勤是你第几个妹妹？会师说：“会勤不是我亲妹妹，也不是我妈生的亲闺女。会勤的父母是我父母的亲密战友。一次，在保定与敌人苦战两天两夜，弹尽粮绝，突围时，被土匪武装部队拆散。清查战场时，发现我父母的老战友牺牲了，战士血流成河。战友为祖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生命。我的父母为



了让战友在天堂不惦记他们的女儿，不担心女儿的生存，就把会勤当做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抚养，决不让会勤受到了点委屈，这是母亲临终时告诉我的。我们兄妹几十年来，都把会勤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我父母平日对会勤疼爱得高于我们兄妹。家中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穿的，会勤在先，我们在后。会勤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让她选。后来才明白父母的用心。因为会勤的父母是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乃至为中华民族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父母要尽最大的力量，让亲爱的战友在天堂放心，不用惦念亲生骨肉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抚养会勤长大成人后，继承父母的坚强，为父母争光，也像父母一样为人民的事业贡献青春。”校党委书记闫子元，校人事处长田雪林夫妇二人，为抚养、教育、培育烈士的后代成才，不惜牺牲自己亲生骨肉的利益，默默地将此事埋在心中。

目前，会勤也应是一个花甲老人了，我对会勤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多年不见，我时常想她及她的哥哥姐姐。更是想念闫子元书记夫妇。

1952年，我在人民大学开办的业余学校毕业。当年，全国各大学校设立的工农速成中学招生，校党委书记闫子元、人事处处长田雪林，校长办公室主任戈

平等领导准我去报考，我被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录取。三年脱产学习期间，除学费、住宿费、饭费、学杂费都免除外，一年两季发服装费。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珍惜这个金子般的环境，学好各门功课，绝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付出。

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不仅让我学文化，还培养我上大学、深造。只因为我的身体不给力。1955年，在天津师院领导二年级一个班进行肃反运动后，患上了肺结核病，这病在农村叫肺病、癆病、癩病、等死的病。天津师院领导劝我回北京在人民大学疗养所养病近一年时间，身体恢复了正常。人民大学把我从死人堆里拉到了人间，我才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在人民大学工作、学习、生活了七十年。我家先后六人在为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后勤建设贡献着各自的力量，全家人在人民大学校内过着幸福的生活。人民大学是我的衣食父母。感谢人民大学对我的培养、教育。今年是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庆典，谨以此文向我的母校献礼。祝中国人民大学，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越办越好，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齐庆才系图书馆离休干部）

喜迎建校八十周年

杨竞儒

陕公精神铸灵魂，
为国育才八十春。
携手共筑中国梦，
科技兴邦立新功。

夕阳红
之声
XI YANG HONG ZHI SHENG





理论结合实践 从教室走向工厂

——记王嘉谟建国初期社会教学

傅积嘉

1953年3月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用较大篇幅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派教员到天津讲课，加强学校和生产单位的联系”，这在建国初期是高校及企业中具有创新和实际意义的一件大事，王嘉谟被称为“打响第一炮”的重要人物。

建国初期，我党由战争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学习和熟悉很多东西。人民大学为了更好地贯彻“苏联经验和中国情况相结合，教学和实践相联系”的教育方针，鼓励全校师生创造性地工作。当时我校来了不少苏联专家，约菲教授是企业管理专家，开设了“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企业管理干部。王嘉谟是其中之一，作为约菲教授的得意门生，约菲曾指定王为其代课。

王嘉谟194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历年各种考试都是全校第一名。解放战争期间任南京市地下党公务员工委书记，解放后为南京机械厂军代表，1950年作为南京市政府工业



王嘉谟 1952 年照片

局干部派往人民大学深造。1952年王嘉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第一届教师研究生班，其毕业论文在1954年6月全校第一届科学讨论会上获得科学作品甲等奖。在毕业时，人民大学反复与南京方面协商，争取到王嘉谟留校任教。

当时天津市委工业部和天津市总工会建议人民大学派教员到天津给工业企业干部讲课培训。校领导和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认为，这样可以加强学

加強學校和生產單位的聯系

中國人民大學派教員到天津講課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室，爲了更好地貫徹蘇聯經驗和中國情況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本學期開始，派教員王嘉謨到天津給各開辦工廠幹部講授「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這門課程。這門課程的講授，受到了聽講幹部的熱烈歡迎，激發了工廠幹部學習業務、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熱情，幫助了工廠管理工作的改進。同時，通過聽講幹部對這門課程的討論，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室也收集了工廠中的許多實際材料，充實了教學內容，幫助了教學工作的改進。

這門課程的講授，是中國人民大學採納天津市工業管理機關和天津市總工會負責同志的建議而進行的。天津市有關方面提出請中國人民大學派教員講課的建議後，中國人民大學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室和中國人民大學學校領導方面作了研究，認爲這樣可以加強學校和工廠的聯系，更便於取得工廠的實際資料以豐富教學內容，所以同意了他們的建議，決定派教員王嘉謨前去講課。講課內容以蘇聯專家約菲教授所寫的講義爲藍本，儘可能結合中國工廠的實際問題進行講解。確定自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起至今年三月底止講完全部課程。並規定在每星期六上午上課。講課在較小的範圍內進行。主辦機關爲中共天津市重工業黨委。聽課的學員只限於幾個重工業工廠的負責幹部，人數不超過三百人。組成企業管理訓練班。但第一次聽課的人數便突破了原定的計劃，超過了五百多人。

由於各單位繼續要求增加學員名額，自去年十一月起，訓練班便改由中共天津市委工業部接辦。現在聽課的已增至一千六百多人，可是各單位還在繼續要求增加名額。

這樣的學習熱潮在天津是少有的。過去天津市各生產單位組織的業務學習多半是虎頭蛇尾，不能堅持下去。這次學習不但能堅持下來，並且人數日益增加，學員情緒日益高漲。其原因便在於工廠幹部迫切地要求掌握業務，而這門課程是真正切合實際工作需要的。此外，教員講解清楚，也是原因之一。

現在聽課的學員包括中共天津市重工業黨委、華北紡織工業管理局、天津市地方國營工業局、公用局等各單位及其所屬各廠的負責幹部。此外，天津市委的其他部分、工會和青年團組織、各報社、人民銀行等單位也都派人參加學習。南開大學和天津市各工業幹部學校的教員也都前來聽課。塘沽、大沽有四十人每逢上課的日子，都起早乘火車前來聽課。學員都按照生產單位編成小組，除了每週上課四小時外，還保證討論四小時（自修時間在外）。各組每週討論的情況和問題都寫成書面報告，送交市委工業部及教員。

在聽課和討論過程中，一般單位都根據所學課程檢查了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並研究了改進的方向，有的單位則根據學會的方法及時改進了工作。例如，在管理組織部分講完以後，大多數工廠都檢查了黨、行政、工會、青年團等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明確地劃分了各種組織的任務和權限。有的工廠研究了改進管理組織的辦法。有的車間主任

《人民日報》1953年
3月9日第三版報道人
大派教員到天津講課

校和工廠的聯系，更便於了解和結合工廠的實際情況，以豐富教學內容，隨採納了該建議，派王嘉謨前去講課。

從1952年9月至1953年3月，王嘉謨每周六上午到天津給企業管理訓練班講課。開始听课範圍較小，計劃人數不超過300人，實際第一次听课人數就超過500人。開課以後，學員們一致認爲這門課非常切合實際工作需要，非常解渴。很多單位也要求派人听课，听课人數增加到800多人。

由於各單位不斷要求繼續增加學員名額，訓練班便改由天津市委工業部接辦，听课人數已增至1600多人。天津

方面反映，這樣的學習熱潮在天津是少有的，過去各單位組織業務學習多半是虎頭蛇尾，不能堅持下去。這次不但堅持下來，並且人數還日益增加，學習情緒日益高漲。他們認爲其原因，一是這門課真正適合實際工作的需要，二是教員講解深入淺出非常清楚易懂。

听课學員包括中共天津市重工業黨委、華北紡織工業管理局、天津市地方國營工業局、公用局等單位，及其所屬各廠的負責幹部。此外天津市委的相關部門，工會、共青團、報社、銀行等單位也派人參加了學習。南開大學和各工業幹部學校的教員也前來听课。塘沽、



大沽有40名学员，每逢上课的日子都要早起乘火车赶来。

学员按照工作单位编成学习小组，除了每周上课4小时外，还保证集中讨论4小时（自修时间除外）。各单位结合所学课程找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根据学会的工作方法研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方法和方向。比如在讲授了“管理组织”课程后，大多数工厂都检查了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划分了各组织的任务与权限。有的工厂研究了改进管理组织的办法。有的车间主任认清了工长的作用，便赋予工长更多的权责，改变了过去直接指挥工人的领导方法。在讲授了“计划工作原理”课程后，学会了用先进技术定额编制1953年计划。

这些讨论情况和问题都要写出书面报告，送交市委工业部和教员。这样上下结合，便于教员与工厂建立固定联系，王嘉谟也了解和掌握了第一手情况。

《人民日报》指出，“中国人民大学采用这样直接派教员到生产单位去讲课的教学方法还是首次。这种方法无疑也是一种培养干部的教学方式，并且是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培养干部的方法。”这种情况如果放到现在，也许会让人觉得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却有很大的创新和实际意义。

人大原党委书记张腾霄盛赞王嘉谟“为人民大学教学走向社会打响第一

炮”。他说：“1950年代初，我协助校领导负责教务行政工作，对教师的研究与教学情况比较熟悉。在向苏联专家学习过程中，王嘉谟首先走出校门讲课或作报告。……他不是照念专家讲稿，而是结合天津工业实际，讲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对改进工业工作有很大帮助。”“天津市委领导和胡锡奎是好友，来看胡校长时谈到王嘉谟的讲座很好，不仅苏联理论讲得好，联系天津实际情况也很具体恰当。他认为‘这个青年很有培养前途’。”“由于王嘉谟的讲座在天津干部中引起震动，不少企业管理干部纷纷要求到人民大学来学习。”

胡锡奎副校长的秘书张井平谈到，1953年4月下旬，天津工业企业干部管理训练班结业，天津市领导特别邀请人大党组书记第一副校长胡锡奎、工厂管理系主任徐伟立、苏联专家约菲，前去参加在天津国民大戏院举行的结业典礼。天津市委书记黄火星、市长吴德到会，黄火星、胡锡奎和苏联专家约菲都讲了话。最后赠给王嘉谟一个银质大奖杯。

在人大曾经学习工作，后调天津工作的罗明铨、王久征说，王嘉谟刚毕业就给天津大中企业及市级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讲课，系统教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听课人数之多，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在解放后还是首次。他们认为王嘉谟的教学非常突出，语言表达能力相当强，加之博学多才，知识面广，分析问题透



1953年第二届企业管理研究生班毕业
（前排左三为教研室主任王嘉谟 左四为依·格·约菲教授）

彻，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听了他的分析，你就能得出必然的结论。他的语言流畅，口齿清楚，声调抑扬顿挫，态度自然得体，毫无做作。他写字刚劲秀丽，圆润飘逸，听他的课既是求知的满足，又是语言和书法上的享受。

改革开放后，1979年，天津市企业管理协会再次邀请王嘉谟来做学术报告，仍然受到热烈欢迎。事隔多年，许多当年听过课的老同志还深情地回忆说：“王嘉谟是我学企业管理的启蒙老师，讲的真好，受益匪浅。”这次王嘉谟是根据1978年随中国企业管理代表团考察美国回来所见所闻做的报告。有的老同志说：“又听到王老师那熟悉的

南京口音尾音儿了。”

《人民日报》的报道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大学这一走出学校办学的做法，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上海虬江机床厂（现上海机床厂）特邀王嘉谟赴上海给工厂干部讲课。记得讲课后奖励他一尊毛泽东、斯大林的铜牌塑像和一身呢制服，这身制服他珍惜地穿了三十多年。

在人大建校80周年之际，回想起历经的点滴往事感到欣慰。王嘉谟给中国人民大学增了光添了彩，践行了人大的光荣传统，这就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敢于创新。

（作者傅积嘉系商学院离休教师）



改革开放中首创在高等院校内实行学院制 ——陈云同志为计划统计学院题写院名

吴微

1978年7月，在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的直接推动下，被停办达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当时，学校百废待兴，人财物全面紧缺，原有教工分散在全国各地，学生在风沙露天吃饭，校长在地震棚里办公，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领导层策划着人民大学的发展与改革如何起步和推进的问题。

鉴于全国急需计划、统计、物价等方面的人才，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陈先，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计划统计系主任李震中共同倡议，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计划统计学院，内设计划、统计、物价等专业，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局联合向教育部提出上述倡议的报告。

1979年10月，教育部批准了这个报告。无疑，教育部已经预见到我国高等教育将有很大发展，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不仅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变化的需要，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要适应这种大势所趋的变化。这是我国自1953年高校院

系调整以后第一次获准在综合大学内实行学院制，对我国高等院校的体制改革发出一个有开创性的积极信号。

但是，人民大学校内对于成立计划统计学院的认识还不一致，主要是成立一个学院以后，担心校内管理体制原有的平衡关系可能会受到了冲击。再说，原来是校、系两级体制，多出一个学院，就形成为三级体制，如何处理校、院、系职能的“虚”和“实”的关系？当然，还有院、系的干部配备、经费等具体问题。为此，拖延未决。然而，在此期间，国内其他院校却援引人民大学获准实行学院制的先例，纷纷在他们校内正式成立了不同的学院。

1984年，全国各领域的改革正蓬勃展开，形势逼人。我向校长办公会议汇报了实行学院制的缘由，兄弟院校成立学院的情况，和国外及新中国建立前综合大学内设置学院的情况。当时我国一些高校已实行学院制的初步经验表明：“学院”具有教学行政管理 and 专业教学、研究的双重功能，而“系”主要是学校内部教学行政管理的单位。各系原来拥有的教学和科研

资源，在改革中以学院为主体分别得到提升、改建、撤并等等。在资源整合基础上，进行跨专业调整。学校校部领导层，具体事务性工作结构性下移，集中精力于发展和改革方面的大事。学院与外校、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更为加强。在校内体制上，大体上是院校两级，院系并存；院实系虚、院虚系实都有，皆由学校和各系、专业的历史、实力、经费来源等条件而定。我建议，人民大学可先实行学校统一领导下，院系并存，院虚系实的体制，即仍以系为实体，院的主要职能暂定为三项：规划，协调，对外。今后，条件变化，再向院为实体过渡。学校领导原则同意了上述建议，并规定，院长由分管的副校长兼任，副院长由院内的系主任兼任。

198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学院正式成立。那天晚间，全校师生大会在灯光球场举行。张腾霄副校长宣读了成立计划统计学院的决定。计统学院的师生齐声欢呼，热烈鼓掌。接着，腾霄同志说，“计统学院对外是学院，对内，是一个系。”于是，全场又是“啊”地一声，是“！”，也是“？”，还有着更为热烈的掌声。师生中微妙、复杂的心情，隐约浮现。因此，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学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创意并被批准在综合大学内设立的学院，但不是这一改革在全国最早的实践者。

计划统计学院成立以后，师生要求有一个院牌，并希望由我国老一辈领导

人、卓有贡献的经济专家陈云同志题写院名并题词纪念。

1984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即将举行，会前，人大副校长、计划统计学院院长李震中应约去国家计委研究有关工作，我也随同前往。我们带去一封要求陈云同志为计划统计学院题名的信。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非常赞同师生们的要求，立即请秘书联系办理此事。

大约一周以后，全国计划会议正在进行，陈云同志即将写好的院名委托大会秘书处转交到我们手里。陈云同志书写的条幅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学院陈云 一九八四年”，行书，大字。共写了三份，风格各异。他要秘书转告我们说，写了三份，请你们挑选。

我们选出一幅，委托山东平度石材厂用黑色花岗石镌刻、涂金，装嵌在学院大门的右侧。在重庆西南铝加工厂工作的校友张大录闻知此事，要去题字的复印件，蚀刻在铝板上，制成大块匾额，空运到北京，悬挂在学院楼内。

陈云同志题写院名的原件，现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现在，人民大学已设有二十三个学院，八十个专业，体制也大体理顺，由学院制带来对整合资源、强化团队、优化管理、提高效率的作用日益彰显，全国各高校内设的学院更有许多创新，成效斐然。

（作者吴微系统计学院离休教师）

从贫苦农家走出的文化巨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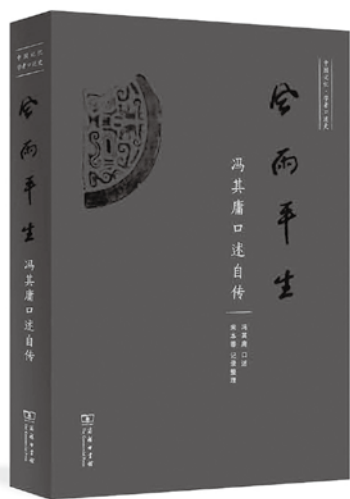
——读冯其庸先生《风雨平生》有感

叶君远

《风雨平生》一书是冯其庸先生晚年所做口述自传，这项工作开始于2012年8月，那时先生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常病卧于榻上，录音断断续续，整理成文字之后，先生又支撑病体，亲自增删修改五次，前后历时四年方始完成。而一年半之后，先生便遽归道山，故此书成为先生最后的遗作。

先生用“风雨平生”作书名，可谓意味深长。从先生自述可知，他这一生曾历经风风雨雨，遭受许许多多磨难与坎坷。先生另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渡尽劫波见光明”，“渡尽劫波”者，正此意也。

人生磨难从先生童少年就开始了，那时家里贫困到经常吃不饱饭，青黄不接时只能以南瓜充饥。生活维艰，求学岂易？偏偏又遭遇日寇侵华，腥风血雨，家乡沦陷，学校关门。他小学五年级便失学，从此天天下地干活。几年后上了中学，念到高一再次失学。但先生并没有灰心丧志，上不成学，就自修；家里



没有书，就四处借阅；干活没时间，就利用深夜、清晨和劳作间隙苦读。几年里陆续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西青散记》《浮生六记》《秋水轩尺牍》《陶庵梦忆》等等大量古籍。还找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和几册有王羲之书法的《淳化阁帖》，照着画画写字。先生自述这一段时间非常难忘，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的自学，自己的兴趣不会那样广。

中年以后依旧风雨相随。解放后一

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先生几乎都受到冲击。“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奋斗”等一项顶帽子被扣到头上。“文革”中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和批斗。但先生一直非常清醒，坚信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人民需要学术研究。这时期堪称奇迹的一件事情足以证明其信念之坚守：造反派抄走了家里的《红楼梦》，当做黄色小说展览。先生痛心疾首，也焦急如焚，担心此风吹向全国，这部奇书将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决心冒险重抄一部。从1967年12月3日开始，每天深夜以小楷精抄借来的庚辰本《石头记》，完全按照原书款式，80回，连正文带批语共70万字，到1968年6月12日凌晨抄毕，历时七个多月。先生自述这一段经历时语调平淡，但联系当时“破四旧”、批判“封资修”、两派武斗的混乱环境，和他人身不自由、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定罪、遭批斗的险恶，他这样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毅力，绝难办到。如今，这部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冯抄本”业已成为红学史上的具有版本和书法艺术双重价值的文物了。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挚爱和传承文化的自觉意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先生求学治学之心始

终不曾稍懈，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读书、研究，终于修成第一等学问。红学、文史、戏剧，深研卓识，皆称大家；诗词、书法、绘画，并所擅长，皆臻妙境；园林泉石、陶瓷紫砂、汉代画像等等，也广泛涉猎，修养深湛。通过这部口述自传，读者可以看出先生是如何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代文化巨匠的。这部书乃是一部自强不息、执着奋进的成才史，是一部足以使懦者立、嬉者戒、怠者起的人生启示录。

冯先生之所以能够在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取得非凡的成就，除了天赋与苦读的因素之外，还有两方面因素不能不提，这就是“舟车行天下”与“交际得胜流”。

先生在自传中说：“我认为一切讨论古代的文化历史的问题，最好是做实地调查”，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走出书斋，“行走在天地间”。自传中好多章节讲到了游历。就拿“文革”在干校的三年来说吧，先生每逢节假日辄外出，其足迹广被赣、苏、浙、鲁、豫、湘、皖、桂各省。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例如去星子县，特别去游览落星墩，因为黄庭坚为这个湖中小岛题写过四首诗；去铅山，寻找辛弃疾墓未果，但发现这里的山都是倾斜的，就像万马奔腾一样往前奔跑，于是体会



到辛词“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描写之妙；去镇江焦山，专门去观赏碑帖史上非常知名的《瘞鹤铭》原石……

“文革”之后，先生更是纵意东西，各处行走，哪怕严寒凛冽、炎暑蒸人，劳碌饥渴，也乐此不疲。他不仅是要获得阅读纸本书籍所缺少的实感，更是要将所闻所见与书面文献互相印证，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曹雪芹祖籍辽阳的考证，对于项羽死亡之地的考证，就都是运用这一互参法打破陈说、取得突破的显例。

直到晚年，先生行走的脚步也没有停止。自传中专门有“十赴西域”一章，写他对于西部历史文化大规模的调查。其主要目的是考证玄奘取经之路，旁及其他。凡玄奘经行、驻足之处，他都根据《大唐西域记》等文献，按迹寻踪，一段一段调查。地形地貌、历史遗迹、出土文物、民俗风情，一一进入他考察的视野。为了确认玄奘取经归来入境所走路线，他登上帕米尔高原，最高到达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这里的发现，让他兴奋异常。亲自目验了“瓦罕通道”路标和公主堡方位，亲耳听到当地流传的波斯商人赶着一千头羊和骆驼，命丧于此的故事，还有“波谜罗川”（帕米尔）、羯盘陀等，无不与《大唐西域记》所记

吻合，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玄奘取经归来正是从这个山口下来的。2005年9月，他又深入罗布泊、楼兰，经龙城、白龙堆、三垄沙入玉门关，证实了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其中整整七天穿行于茫茫戈壁，风餐露宿，可以想得到有多么艰辛，但是在自传中，先生只讲获得新发现的快乐。

古人早就强调过“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像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顾炎武……无不是“车迹、舟船半天下”，至于佛学大师玄奘、地理学家徐霞客更是足迹远至天涯绝域。在这方面，冯先生同那些古代先贤一样，也是真正的践行者。

“交际得胜流”，指的是与真正有学问有专长的第一流人物交往。冯先生喜交友，一生中和许多大学者、大艺术家交往不断。仅口述自传所提到的就有俞平伯、谢无量、郭沫若、唐兰、启功、季羨林、姚奠中、饶宗颐、翦伯赞、苏秉琦、卞孝萱、杨廷福以及海外的周策纵、余英时等等一大批硕学鸿儒，书画界有刘海粟、朱屺瞻、张正宇、黄永玉、许麟庐、关良等等大画家，戏剧界有田汉、周贻白、阿甲、祝肇年等剧作家和学者，也有马连良、盖叫天、李少春、厉慧良、关肃霜、袁世海、赵燕侠、侯永奎、王传淞、张娴、张继青、陈伯华

等等表演艺术家，此外还有红学家吴恩裕、李希凡，敦煌学家樊锦诗，古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文博专家姚迁，西域考古专家王炳华，武侠小说家金庸，服饰专家黄能馥，古代家具专家陈增弼，紫砂工艺家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等等，至于当年无锡国专的老师王蘧常、钱仲联更是请益受教几十年。如果看过先生另外两本书《墨缘集》《瓜饭集》，就知道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更长。冯先生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挚交，建立了真诚持久的友谊。他们或因文字结缘，或因艺事相知，或因学问相慕，总之是精神与气质相投，爱好与意趣相合，品味与格调相契。先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会与高人期物外，五千年事上心头”，可见先生希望与所钦佩的这些学者、艺术家们一起来切磋交流他们共同心心念念的传统文化，在非功利性的交往中享受境界提升、超脱凡俗的精神愉悦。

冯先生博闻广识、多才多艺，显然与他不断虚心地与那些学者、艺术家交流、广采博纳有关。就拿他与戏剧演员的交往来说吧，从口述自传可以看出他结识了众多的优秀演员，而且是倾心相交。戏剧演员一般文化程度不高，但先生却是把那些演员“作为优秀的老师来看待”，觉得“听戏曲演唱等于上戏曲

史的课”。去看戏他常常带着剧本，与表演对照着看，认为“光看剧本，还是一个文字的、书面的，只有看到舞台上的演出，才是立体的，才是行动的，理解起来就不一样了”。先生的戏曲知识那么丰富，那么专业，周信芳、厉慧良、袁世海等等戏曲大家都倾听过他的意见和建议，把他的评论看成是切中肯綮的行家之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部口述自传所记录的冯先生与那些学者、艺术家交往的轶事，不仅读来津津有味，而且给人很多的联想与启示，它们或将成为当代文化史上有趣且有意义的资料，

古人总强调“道德文章”，将道德与文章并提。这很对，一个人的道德境界会深刻影响其学术境界。上面已经讲到了冯先生许多方面的珍贵品德，如信念坚定、待人真诚、虚怀若谷等等。这里想着重说说先生讲事实、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一面。

口述自传记录了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回老家看望重病的母亲，亲眼见到堂叔和小时伙伴的母亲饿死，听到当地百姓的诉苦，心想家乡是鱼米之乡，怎么会饿死人呢？不正常啊。回到北京就写了一篇报告叫《回乡见闻》，把听到见到的都写进去了，上交给组织。在当时极左的气氛中，敢



于直面现实，秉笔直书，该需要多大的勇气！“文革”中，这篇《回乡见闻》被造反派当成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要他低头认罪。他回答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跟我到我老家去调查，开农民大会，把我的报告念给老百姓听，让他们听听我讲的是谎言还是事实。如果你们不去调查，去面对老百姓，那我决不会认罪。

再一件事是“文革”中，“四人帮”搞评法批儒运动，先生受命为《李卓吾文选》撰写一篇序言，而且明确告诉他，要写“李贽是法家”。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李贽，既然要写序，就把李贽的书全部买齐，从头到尾反复读了好几遍。读完之后，认为李贽绝对不是一个法家，不能为了附和“四人帮”硬把他说法家，因为没有任何学术依据。但序言又不能不写，于是就照着自己的理解评论李贽，从头到尾都是根据李贽的原话得出结论，每提一个问题，都用李贽原话来证实，所以文章写得很长，但就是一个字都不提李贽是法家。结果文章送上去就被退回来，说不能用。先生心想这正中下怀。

口述自传中还说到另外一件事，“文革”结束不久，极左思潮仍然禁锢人们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

一文，引发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安排发表的，为的是纠正还在禁锢人们思想的“文革”余毒。后来别人发现，冯先生在10个月前出版的《论庚辰本》一书中就公开申明了这一观点，该书序言说：“我坚信科学上的是非真伪，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自信而只能由客观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书的结尾讲得更加明确：“究竟是谁的意见比较地符合这些版本的客观实际情况，这要由客观实践的检验来加以鉴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年龄大一点的都知道，1977年，“两个凡是”的论调还统治着思想界。冯先生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公开申明这样的观点，有人以为是先知先觉，实际这是出于他一贯坚持真理之必然。

尊重事实，信守真理，绝不说假话，绝不做违心之论，为先生一辈子所坚持之准则，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待人处事上都是如此。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令我们景仰，其事业需要我们继承；而他的人格，他的道德，他的人生境界，更值得我们钦佩，更应当发扬光大。

（作者叶君远系文学院退休教师）

“孝老爱亲”

杨先举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80 周年校庆征文，其征稿内容有，“分享人生经验”，那就让我写一篇我对于“孝老爱亲”的人生体验的文以应征吧！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谈到“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孝亲敬老等传统美德。”

“孝老”。这里所说的“孝老”主要是指孝父母。

“百善孝为先”。“孝”是描述作人子的对父母的应有的一种伦理规范。在儒家学说中倾力提倡之。在儒学典籍《论语》一书中就有关于“孝”方面的话有 19 处之多，著名的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

父母生我、育我，我对父母不孝还是人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不孝，你这个人连

犬马都不如了。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该书的插页有两幅彩照，一幅是习总书记推着轮椅在走，轮椅上坐着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旁边还有习总书记夫人彭丽媛同志及其女儿陪着；一幅是习总书记搀扶着他的妈妈齐心同志走路。读该两幅相片无限感慨，深感习总书记与其夫人对父母的孝！

什么是“孝”？我的理解是“善事父母”，内含六点：1，赡养父母；2，敬重双亲；3，用爱来愉悦老人；4，规劝父母行善；5，不做有损父母声誉的事；6，不做无谓的有损父母给我身体健康的事。

“孝”是绵延人类的需要。子女有了“孝”，当父母的有了“慈”，父母子女关系和谐，天才不老地才不老。

《孝经·三才》说，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道也。”我们一定要讲“天之经”，“地之义”，“人之道”。

我有三位女儿，她们都不在我身边，



全在外地，她们对我极孝，为了我一人生活得好，为我请了一位阿姨照顾我，逢年逢节来看望我。

唐朝诗人孟郊写《游子吟》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用寸草之心，来报答父母对我们施与的三春之爱。

“爱亲”。这里的“亲”指长辈，包括父母及祖辈。我把它界定为“老”。

“老”是值得亲的，爱的，敬的，尊的。“老”，他原来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他承上，上承过去，他启下，下启未来。他带着人生感受而来，总结人生经验而去。携着参与工作的劳顿而来，迎着人生眷恋的夕阳而去。今天的“老”，依然满腔热情地虔诚地祝福着祖国强大。

郑板桥写了这样一首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郑诗就是歌颂“老”的可贵。

亲老，爱老，敬老，尊老，就是亲、爱、敬、尊人生，因为人生中有老；就是亲、爱、敬、尊生命，因为老是生命中的一个内容；就是亲、爱、敬、尊社会，因为社会离不开老；就是亲、爱、敬、尊祖先，因为我们是祖先生化下来的；就是亲、爱、敬、尊人类，因为老是构成

人类的一个部分；就是亲、爱、敬、尊未来，因为未来是老传承下去的；就是亲、爱、敬、尊历史，因为历史是一条链，幼年、中年、老年，老年是这个链中的一个环；就是亲、爱、敬、尊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也会老。

《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语意是我敬重我的长辈，推而广之去敬重他人的长辈；我爱护我的幼辈，推而广之去爱护他人的幼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种良好社会景象：它长幼有序；是和谐社会景色。在这样的社会里，老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幼少者也好，都愉快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其情切切，其乐融融，花开红红，草长青青。

我今年87岁了，我惜老，我要爱护我的这个老，让我优雅地活着，活到我的人生终点。我要知足常乐地活着，顺其自然地活着，仁德怀心地活着，少私寡欲地活着，心胸开阔地活着，微笑堆脸地活着，生活有序地活着，作息有规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嘻嘻哈哈地活着，活到“米”字年龄，活到九十寿年龄，攀登期颐高峰。

（作者杨先举系商学院退休教师）

青春年华，又在眼前

杨汝芬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向往已久的学府。特别是艾思奇同志鼓励我“实践、实践，理论、理论”之后，更坚定了我报考人大的志愿。1958年，适逢人大哲学系招收研究生，报名后，学校寄来考试题，有哲学专业题，还有古文。题目是将《史记》中的《孙武列传》原文点断。我怀着一腔热血，认真把考题全部完成。后来，录取通知来了，我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啦！好兴奋、好兴奋啊！

1959年秋，我来到北京。提着行李，进了校门。站在学校的路边张望。这时，走来一位瘦瘦的教师模样的同志，亲切地询问并帮我把行李提到东风一楼的四层。安顿好后，又带我参观教学楼、食堂，使我从心里感受到人大的温暖。

入校不久，大家推荐我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兼校广播站站长。我们去拜访了吴玉章校长，到党委宣传部请示工作。校园里，每天都能听到我们的广播，

深受师生们欢迎，工作开展得十分愉快。

195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不仅要参加庆祝，还领受了摆国徽图案的任务。国庆当天一大早，我们便从学校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天安门城楼，按统一指令把手持的鲜花举过头顶，组成国徽图案。我身穿白衬衣、蓝色西服裙，站在金色麦穗的队列中。

庆祝大会开始后，我们近距离地观看游行方队。最后，和少先队员一起奔向金水桥。观礼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使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向我们挥手致意。同学们万分激动，欢呼雀跃。

中午，在广场小松树林休息时，我跑到电报大楼，给丈夫发电报，让在西藏守卫边防的爱人，分享我的幸福和欢乐。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吃的是“增量法”蒸的米饭，水煮的白菜帮，可大家学习热情依然很



高，不仅学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学习了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自然辩证法等课程。

1960年，学校安排我们七个研究生到西郊香山大队做社会调查。社会调查说不上成功，却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到农民家了解情况，在大队和公社查看资料。一日三餐，在大队食堂外排队吃大锅饭，此情此景，成为了我们深刻的记忆。

学习期满，回到家乡。领导鼓励我给千余名市直机关干部、驻军官兵、工厂工人辅导《实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受到好评。我也被选为先进，作为代表出席省、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我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到京后，和爱人一起来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看望罗国杰同志，他热情地介绍了

学校的巨大变化，我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只见他的住处堆满书籍，真不愧是我学习的榜样。临别时，他推着半旧的自行车送我出校门口，老远才回去。

后来，母校将一些老照片征集汇总成《人大记忆》。我手捧《人大记忆》热泪盈眶。青春年华，又在眼前。1959年国庆，人大学生会同学在校门口合影；1961年，人大广播站播音组欢送毕业生合影；1961年，人大哲学系研究生游览颐和园合影……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深深感谢《人大记忆》，使我又回到青春再现的日子。

感恩母校真情无限，祝愿母校前程无限。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杨汝芬系中国人民大学1962届哲学系研究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回忆罗列主任

于庆田



2010年11月6日，罗列受邀参加新闻学院成立55周年庆祝大会

“

罗列，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新闻教育家。原汕头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新闻系主任、教授。曾积极参与我校的复校工作和汕头大学的筹建工作。

罗列同志于2012年9月22日在北京去世。病重期间，我曾两次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叙谈良久，并合影留念。他总是愿意让我们多坐一会儿，拉着手

不让离开。可是为了他的健康，根据医生的要求，我们又不得不依依惜别。

1964年秋，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本科，当时罗列任新闻系系主任。



只有系里开大会的时候,才能见到罗主任,他的广东口音很重,他讲的话我只能听懂一半。有一天学校开运动会,吴玉章校长坐在主席台上,郭影秋书记带领各系领导在400米跑道上竞走,当罗列主任经过主席台前时,吴玉章校长突然喊:“罗列加油!”我们作为新闻系低年级的学生,当时也感到无比光彩,心想,一些校领导和各系主任都在竞走,为何吴老单为罗列主任加油呢。这又让我增加了一分对罗主任的敬意。其实罗列主任刚开始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新生并不熟悉,直到我读大二时入了党并担任班干部,他才与我对上号。

后来他率中国新闻代表团去越南访问,写了不少抗美援朝的新闻报道。回京后他给我们作出访报告,特别讲到胡志明主席接见他们,开始西装革履,个个汗流浹背,那时又无电扇空调,胡志明主席说,罗列同志,你们把西服和领带取了吧,这么热天,咱就不拘礼仪了。一下子大家解放了,接见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在胡主席面前谈了许多有趣问题。罗列主任还拿出他与胡志明主席的合影给我们看。

不久我就毕业了,离校前罗列主任把我叫到他跟前,当面告诉我:“你被分配到国防科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我的老战友张雷平少将在那里当政治部主任,你报到时如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

好。你要在部队好好表现,努力工作,那里很艰苦。”

第二天,我告别母校,乘火车直奔大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待我去报到时才知道,张雷平主任因重病在京住院。直到张主任去世,我也没把罗主任的话捎到。若干年后,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在通州见到张雷平主任的夫人林杨大姐,才说到罗列主任毕业前给我的嘱咐。她高兴地说,原来你是罗列的学生啊,我们当年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友。

七十年代末,我正式调到北京国防科委机关工作。此后我和罗列主任见面就多了,谈话议题也广泛了。时间长了,师生之间成了朋友,几乎无话不谈。他经常对时政谈些自己的看法,思想比较解放,支持新生事物,鄙视拉关系、走后门和贪污腐败之风。

他当系主任期间,对农村来的贫困学生向来比较关心。我们全年级的贫困学生,他绝大多数都能叫上名字来。当时,我们每人每月有15.5元的助学金,吃饭完全够了,个别特困生还可以多发几元钱。同时,他提倡男女平等。新闻系1963级只招了25名学生,其中只有一名女生,到我们1964级就招了50名新生,并且分成文字、摄影两个专业班,有近10名女生。尤其是从士兵和农民中招了七八名统考生,他们年龄偏大,助学金也有25元左右。但罗列主任赞

赏广泛统一招生的政策，提倡增加女生比例，主张男女生平等，对应届高中生和往届工农兵考生一视同仁。

另外，在我毕业前夕，新闻系曾派我去大连访问并邀请老校友高玉宝和他妻子姜葆娥（均为新闻系校友）回母校作报告。罗列主任非常高兴地与高玉宝夫妇叙谈当年在校的往事。说到往事，罗主任和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学校建校初期要修游泳池，为了勤工俭学，我们学生主要去当小工推小车，拉水泥、石子、沙子浇注钢筋墙。一天下午，我们汗流浹背地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吴玉章校长来看大家。同学们放下小推车休息，也顾不上穿外衣，簇拥到吴老身旁合影留念。吴老也很高兴，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施工质量，大家更是干劲倍增。工地离我们系很近，待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罗列主任他们系领导过来。若干年后，我曾问罗主任当时是否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吴老去工地，那很正常，各干各的事。

罗列主任是一位重视新闻教学业务和师资队伍建设的系主任。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是新闻教研室主任，非常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倡导除专业课外，还要学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程。他发表的《目前新闻教育的几个问题》《十年来的我国新闻教育》等论文在新闻教育界有较大影响。

他任系主任期间一些教学骨干如甘惜分、方汉奇等，后来也都成为新闻教育界知名度很高、很有影响力的“台柱子”。

罗列主任是位慈祥宽厚、关心他人的长者。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同学，毕业后多年婚恋受挫，甚至有轻生念头，去找罗主任倾诉。罗主任把他收留在自己家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终于使这名同学振作起来，全新地投入了工作，后来这位同学成为了北京两家重要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该同学多次对我说，在他人生最困难的关头，是罗列主任收留、点拨了他，才让他重新振作，罗主任是他的恩人。罗列主任把他当知心朋友，平时也来往密切。

90年代组建汕头大学，罗列同志被调任做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每年他从汕头回京，我们班上在京的七八位同学聚会，总爱把罗老师请上，师生共叙国家大事、教育形势和家长里短，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罗列主任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和优秀品质却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于庆田系我校新闻系1964级本科生，少将军衔，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政治部主任，军械工程学院政委）



难以磨灭的印象

刘佩弦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光明的解放区，奔向日夜向往的华北联合大学。我那时也是作为一个燕大的学生，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解放区华北联大的。

那是在1946年的春天，北平的气候还非常寒冷，我经过一番艰苦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刚解放不久的张家口，即当时华北联大的所在地。

当我踏上张家口的街道时，已是深夜。凛冽的寒风，纷飞的大雪，简直使我辨别不出方向。在我走进华北联大的招待所时，已经疲惫冻饿不堪。招待所的同志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来接待我。他们一面亲切地询问我一路上的情况，一面把一碗滚热的开水和一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让我第一次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过了几天，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我被录取了。随后政治学院的十几个同学就来接我，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灰色棉军装。其中有几个女同学，也都是这样

的打扮。他们都显得非常活跃，在他们健康、红润的脸上呈现着活泼、欢乐的表情，这使我感到非常新奇，觉得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他们知道我就是他们要接的新同学时，便马上围拢来，热烈地同我握手，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北平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接着他们便高兴地带着我回到了我们的学习小组。从此，我便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同志，开始过着一种朝夕相处、团结战斗的学习生活。

我们这个小组共有12个同志，设有正副组长各一人。正组长管学习，副组长管生活。

男同志都住在一间房子里，大部分睡的都是地铺。女同志住在另外的宿舍，平时大家都在男同志住的这间房子里活动。当我一进入这个集体，就深深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同志间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我刚到学习小组时，由于新的棉衣还

没有发下来，我穿的仍然是一件中国旧式的长袍，总感到有些别扭。这种情绪很快就被同志们发觉，于是立即拿给我一件罩棉袄的制服。当我高兴地穿在身上的时候，才知道这件制服是一个女同志提供出来的。这使我又感激，又不好意思。

我们的组长很活跃，又很机警，大家都叫他“猴子”。每次站队出发前都由他指挥领唱革命歌曲。同时他又很会做思想工作，谁有了什么思想问题总爱找他谈谈。我们的副组长，忠实淳朴，是大家的好管家。每次伙食方面有什么问题或安排生产劳动时，他总是耐心地同大家商量，并带头参加劳动。我们组有两个女同志，是从延安随校来的，对待同志特别关心、细致，总是热心解决同志们生活上的困难。

大家的的生活是很有纪律的。每到开饭的时候，总要先集合，每人拿着自己的碗筷，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前去。值日的同志提着准备盛菜的铁桶跟在队伍的后面。炊事员同志一般是把盛馒头或小米干饭的筐箩放在广场上，同志们根据需要各自去取，然后大家围着打来的菜共同进餐。一般一个月都要用伙食尾子改善一次生活，大家习

惯叫做“打牙祭”。

平时的学习很紧张。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等，是大家阅读和学习的主要内容。除了听教员讲课外，还经常听报告。成仿吾校长、周扬副校长、何干之院长以及其他许多有名望的人经常作全校性的政治形势报告或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很受欢迎，听众往往把一个简陋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因而有些人不得不坐在外面听。听完课或听完报告之后，要进行小组讨论。对于这些讨论，大家是非常认真的，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往往争论几天都相持不下。

大家对于世界观的改造是很注意的。除了经常用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武器，对照自己进行检查外，还经常开展谈心活动。每到晚饭之后，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在校园内边走边谈，这正是同志间彼此交流思想、互相帮助的一种形式。

除了正常的学习外，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校外活动，如进行宣传活动、参加劳动等等。有一次，张家口市进行人民选举。为了配合这一重要政治活动，全校师生都化装到街头扭秧歌舞、演街



头剧等。这一活动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老大娘、老大爷笑逐颜开，给我们送茶送水，这使我们受到很大触动。另外，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如到校外参加修筑堤坝等。这些活动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刚从旧大学来的青年学生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感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久，我们就在国民党飞机的轰鸣声中撤出了张家口，开始向冀中转移的长途行军，并在途中分别被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于是，我们的这段有意义的

学习生活也就结束了。

总之，这一段学习生活的的时间并不长，一共只有几个月。但是这短短的几个月，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直到今天，对于当时经历过的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对于当时在一起学习和生活过的同志，仍保持着一种深厚的感情。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刘佩弦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学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

您好，我的乳母——华北联大！

穆扬

张家口——美丽的山城，从1946年我们撤离这座城市以后，我再没有到过那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使我又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大好河山，算来已经过了34个年头了。

34个年头，漫长的岁月！它改变了人们的容颜，也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但是，我在到达这个城市后，还是沿着依稀可辨的道路两次走到了东山坡，来寻觅34年前曾经在那里学习、生活过的华北联合大学旧址。那西山顶上夕阳的余晖，那黄昏后市区的万家灯火，使我久久地沉浸在遥远的记忆中。

1946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在各解放区周围调兵遣将，准备随时打内战，伺机侵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在蒋管区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于是，大批不堪迫害、向往民主与自由的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已经解放的张家口。

解放区需要这批年轻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对于解放区和共产党多半是不够了解的。当时在张家口市的华北联合大学承担了培养这批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民党统治的北平的一所大学来到张家口，并很快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

当时的华北联大有文学、戏剧、音乐、俄语等几个系，有艾青、陈企霞、崔嵬、牧虹等许多知名教师。而我到了华北联大，却被分配到了政治二班。政治班实际上是短期培训班，学员的文化程度和年龄都差别很大。有从美国回来的军事院校的学生，也有只上过几年小学的土八路；有十五六岁的小弟弟，也有30来岁的老大姐；有汉族，也有蒙古族、满族和回族。所学的课程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教员也多半是当时尚未出名的“小人物”。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学没能分配到各个系去学习，已经感到失望，再见到这种课程和教员，自然更为恼火。



因此，开课不久，就有人开始旷课、逃学。记得我就和几位同学在课间跑到校外去闲逛过，结果害得学校干部和学生干部到处找我们，找到后动员我们回去上课，大家勉强回去上课了。但是，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却又使一些同学产生了新的疑问：我们逃学是谁汇报的？我们私下的一些想法和议论，学校领导和班干部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些问题像针一样扎在我们的感情深处，使我们这些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战士”难以接受，因而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

但是与此同时，学校里又有一些使人惊奇的新鲜事物开始吸引我们。成仿

吾校长身上那套肥大的八路军服、诗人艾青脚下的那双黑色的土布鞋以及同他们见面既不称职务又不叫先生或老师，而统称“同志”的情形，同我们过去上过的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使我们感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一个我们还不熟悉、需要从头了解的新天地。

“七一”和“八一五”先后到来，学校的文工团走上了街头，教员和学员也组成了许许多多的街头宣传队。崔嵬、牧虹、王昆、李波等同志都随着秧歌队来到工厂、学校和市民当中。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夫





妻识字》等节目，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前所未闻、历来未见的。这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感动得流泪，也令我们深思、陶醉。因此，我们也很快就情不自禁地被卷进了一支秧歌队，迈着蹩脚的步子，唱着刚学会的歌出现在大街上。这时，群众端茶送水，高声赞扬共产党、八路军的热情场面，更使我进一步感到光荣、自豪、幸福，有时让人夜不能寐。

人们都把党比做母亲。那么，华北联合大学就应该说是一位满怀慈爱的乳母。是她，用自己生命的乳汁哺育了我们这批刚刚投向革命怀抱的青年学生，把我们领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8月间，在国民党军队即将大举进犯解放区

之前，华北联大先期撤离张家口。这时，我们虽然预感到革命又将进入一个困难时期，但我还是用节余下来的生活费从农民手里买了一双鞋，毫不犹豫地、乐观地跟着学校向晋北和冀西的山区撤去，准备同国民党长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

34年后，当我再次来到张家口的时候，我怎能不深深地思念起乳母——华北联大呢？你好，华北联大！你好，我的乳母！夜深了，山风习习，我仍然伫立在东山坡上，久久不肯离去。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系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学员）



华北大学入学记

张景良

北平报考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结束，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的家乡——河北省新城县离北平有100多里，地处北平、天津、保定的三角地带，已在1948年解放，我当时正在新城县师范学校读书。

一天，我刚刚下课，见到一群同学在争看一张《人民日报》，走近一看，原来上面登载了华北大学招生的消息，我们师一班同学对考华大最感兴趣。后来通过县长秘书出具证明，由我带领同班6位同学坐马车到涿县，再从涿县火车站挤上火车到了北平永定门站。华大的报名地点在铁狮子胡同一个大四合院内，中间有座席棚，分口试处、填写登记卡片处等。最有意思而又最让人担心的是口试，应考青年排成一条很长的队，要依次回答主考人的各种提问。正在忐忑不安时，主考人叫到了我的名字。他

问：“你为什么要考华大？”“为人民服务！”我坚定地回答。主考人面带微笑地向我点点头，我紧张跳动的心顿时平静下来，只觉得心窝里热乎乎的！后来又通过一次笔试，于当天返回，就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了。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迅速向前发展，每天都要列队迎送南下的解放军。我们回校上课已经一个多月了，还不见华大入学通知，心里非常焦急。经过商量，决定到北平去看榜。因为我们是瞒着学校和家里报考华大的，所以当天晚上，几个在师范住宿的同学将自己简单的行李偷偷地搬到在县城内住的同学家后院，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预先约定的马车已经停在门口等候了。我们坐上马车朝着北斗星的方向一直往前走，为了远大的未来、为了全中国的解放，我们不辞而别。

到了北平，人力车拉着大家的行李



来到铁狮子胡同，华北大学已经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名单很多，贴满了院内外的墙壁。我们分头去看，突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来看，这儿有咱们的名字！”大家一拥而上，只见榜上写有张景良、张维端、张维邦、翟惠昌……哈哈，都录取了！我们很快地来到崇文门附近一个小院报到。工作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深灰色粗布制服和帽子，再在上衣口袋上方缝上一枚布质胸章，上面印着四个大字：“华北大学”。第三天一早，我们操着不同口音的八九十人坐上一列闷罐车，到了华北大学天津分校。

天津入学

当时的华北大学天津分校设在天津特一中学校内，校舍是一幢四层大楼，我们从北平来的同学住一楼，编在九十九班。这一班又编成12个学习小组，每组最多12人。我们上的第一课是“华大介绍”，讲的是华北大学历史沿革。这时我们才知道北平解放前华北大学建在河北正定县城，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从1948年到1949年已培训了上万名革命青年。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始终是比较紧张的，早晨要集合出操，出完操要带着小马扎集中去听大课，经常有领导同志前来作报告。有时候听报告的人太多，坐

下来太占地方，大家便索性站着听，可是精神仍很集中，回来后再进行小组讨论。我们每天吃两顿饭，平时都是小米干饭和窝窝头。开饭时，小组轮流派人到大厨房去打菜，用瓷盆打，多数是炒土豆、熬白菜。小米饭装在竹筐里，炊事员事先帮助装好统一放在广场上。

在特一中学校址学习了约一个多月，华大天津分校奉命搬到天津市东郊的东局子。那里周围没什么居民，环境幽静、大树参天，四周还有小河流，出入只能通过唯一的大南门。中间有个大操场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场所。我们九十九班住在西侧5间红砖红瓦的平房里，先后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有时也到天津市内听报告，每次都要带小马扎和水壶，一边走，一边唱着歌通过金汤桥和闹市区，好不威武。

迁到正定

不久天津分校撤销，合并到华大正定分校。正定在石家庄以北、滹沱河畔，是一座古城。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就设在县城内的大佛寺里，正面南大门墙上书写着约两米见方的宋体大字“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校训。我们在正定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举行开学典礼

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6篇著作，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为全国人民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初步树立起来。我们新城师范来的张维邦、张维端、翟惠昌在这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时光过得很快，不久学习就进入了思想总结阶段。每个同学都要把自己的思想收获写出来，由小组评议通过，再作思想鉴定。

华北大学这个革命熔炉，为我们铸造出一颗颗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赤子之心。毕业前夕，学校负责人作动员报告，要求我们去西北做为人民服务的“骆驼”，到南方做为人民任劳任怨的“大水牛”。我们响应号召，听从党的安排，我和张维邦、张维端南下，翟惠昌到华北军区，张子宏到大西北，时得贵分配在华北局。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系华北大学一部九十九班学员）

华北联合大学的课余生活

马琦

华北联合大学是一座战火中的大学，数千学子在战斗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是严肃、紧张的，又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时时处在欢快之中。

张家口的舞会

每逢周六晚上，健康、欢快的舞曲就响起来了。校部大礼堂的舞会有文工团的乐队伴奏，师生们翩翩起舞，直到午夜。延安来的同志舞步轻盈、婀娜多姿，使很多初学者不禁投以羡慕的目光。各院、系在驻地也常开舞会，虽伴舞乐器简单，但中间穿插几曲《兰花花》《信天游》，也赢得阵阵掌声。有组织的舞会如果没开，舞迷们也不甘寂寞，在空地、教室里小手风琴一拉，自发组织的小型舞会就搞起来了。热衷跳舞的舞友们闻声而至，彼此虽不相识，邀请舞伴也不会遭到拒绝，因为大家都是华北联大的革命同志。

秧歌越扭越上瘾

1946年春节是张家口解放后第一个春节。为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华北联大组织了三四百人的大秧歌队在市内街头宣传。平津来的青年开始接触秧歌，由文工团的老师来教。同学们抛开羞怯，扭动腰肢，从笨手笨脚到感觉自如，越

扭越起劲，什么“二龙戏水”“大游四门”“龙摆尾”“白菜心”等等，从熟练到有些韵味。及至化上妆，男同志穿紫花布衣服，扎上英雄巾，女同志穿上彩衣，舞起彩绸，就进入了角色，扭上半天也不累，越扭越上瘾。4月张家口选举市参议员时，又组织了大秧歌队，我们的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有些买卖人抛下生意不做，跟着秧歌队看一天。此后不仅文艺学院的学员早晨扭秧歌，别的院、系、班也把扭秧歌当做早操内容之一。娜孤歌是有挪威血统的女学生，有一次她去打开水没有按时回来，原来是在路上听见鼓声，放下水桶，围着小水桶就扭起来，一时传为趣闻。

从张家口转移到束鹿农村，舞会不开了，扭秧歌更风行，受到冀中群众欢迎。每逢节日活动，师生们总是和农民扭在一起、唱在一起、欢笑在一起，真是和农民打成一片。

驰骋在篮球场上

华北联大聚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中青年教师，自然就有一大批球场上的好手。平时师生们课余时间就驰骋在球场上。每逢重大活动，篮球比赛总是令人感兴趣的节目。院、系、班、



组之间也经常组织友谊比赛。最盛大的一次是1947年十月革命节举行的篮排球比赛，平原宣教团三中队（文艺学院）获得篮球比赛冠军。戏剧家崔嵬、诗人李冰任中锋，音乐家张鲁任后卫，这些著名的艺术家球技高超、奔跑矫捷，博得观众阵阵喝彩。

校园里处处有歌声

到解放区第一个感觉就是人人爱唱歌、处处有歌声。开会前有音乐老师教唱歌，各单位之间相互拉歌，晚饭后要练歌，集体行动要唱歌。哪个班不会唱十几个歌，会前在拉歌的掌声中被逼得哑口无歌时，真会羞得无地自容。回去后只好由文娱委员多教多练，下次会上好一雪“班耻”。

唱歌不仅为自娱，也可以做社会宣传，还可以表示欢迎、表示示威、表示斥责。张家口广播电台建立时，就请政治班去唱歌，进行广播宣传。北平大学生代表团来张家口华北联大参观，我们唱歌热烈欢迎。军调部的国民党军官来参观，我们在校部大礼堂用雄壮的战斗歌声显示了巨大的威慑力量。

精彩纷呈的晚会

每逢重大节日或重大的革命聚会，华北联大在大会之后总有精彩的文艺表演。各基层单位也经常组织大大小小的晚会。各班、系的小晚会多属自发召开的，领导支持、师生同乐，张家口的教室、束

鹿农村的场院都是会场。师生们独唱、讲故事、说笑话、做点滑稽表演，各显其能，有的很精彩，也有的令人捧腹。还有的是主题晚会，像五四青年节、教师节时师生们在一起亲切交谈，讲感想、读自己新的诗作、唱自己新创作的歌曲等等。最有诗意的是小型月光晚会，若从伙食结余中开支买点枣、梨、葡萄，那就可以大饱口福了。

有的系还成立了俱乐部，挂上灯谜纸条，准备了扑克、象棋、麻将，有时还借来留声机，大家可以随意参加游戏、下棋、打牌、跳舞，一扫平日的紧张疲劳，遍体轻松。

到束鹿以后，文艺学院经常举办水平很高的艺术晚会，内容丰富，保留节目有沙可夫院长的独唱《伏尔加船夫曲》，周巍峙的绝技《矮子走路》，张鲁、贺敬之清唱郿户戏《张连卖布》，张达观、林里、穆毅、张悦的小提琴四重奏，李元庆的大提琴独奏，石坚（李一鸣）的小提琴独奏，朱子奇的俄罗斯民歌独唱，郭兰英的山西梆子《见皇姑》，给大家以高雅的艺术享受。每次艺术晚会都有许多政治学院的同学从杜科来看，他们说在国统区很难看到这样精彩的晚会，会后兴奋地谈论着节目，沿着战备的道沟走回驻地。

每当想起那些精彩纷呈的晚会时，我不禁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马琦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员、文工团干部，中央戏剧学院离休干部）

战火中的青春

刘志

青春啊，青春！

我们的青春在战火里度过，那是艰苦的青春，战斗的青春，也是美丽的青春，难忘青春……我和同学们的青春年代，是在华北联合大学中学部和边区中学度过的，那时正是敌后抗日最艰苦的岁月。虽然光阴已迅速地逝去，但是当年战斗、学习的情景却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每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总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中学部是1944年由晋察冀边区四个中学合并而成的。学员大部分来自抗日根据地，少数来自游击区和敌占区。其中，还有不少是从根据地各个工作岗位上选调来的优秀基层干部。教师质量也较高，大都来自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大等校，他们都是满怀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如当时讲授社会科学课程的宋涛老师、讲授语文的郭汉城老师等。

学校虽然以文化教育为主，但也注重政治教育，注重让学员在抗日实践中增长才干。除上文化课以外，还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学校领导经常请校外有关人员作当前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特别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培养我们青年高尚的思想品德打下了基础。那时党对学校的领导是坚强的，强调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党组织发展较快。

为了适应敌后的战争环境，学校强调生活战斗化，经常在深更半夜紧急集合，搞演习。我们女生班动作比较慢，但又不甘心落后。有一次，我们察觉到又要搞演习了，我们晚上不脱衣、不盖被，预先把背包悄悄地打好，一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就背起背包往外跑。我们班第一个到达集合地点。我们很得意，以为这次讲评，我们班一定要受到表扬。结果领导了解实情后，我们反而挨了一



顿批评，班长作了检讨。

学校重视通过社会实践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我们不仅是学生队，而且也是宣传队、工作队。无论是打游击，或是校址迁移，所到之处，一住下，首先搞社会调查，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同时，组织医疗小组，为缺医少药的贫苦农民服务。那时，边区患疟疾比较普遍，校医教我们用针灸来治疗，效果很好。我们还经常配合边区建设的中心任务搞宣传，如演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很受群众欢迎。

师生团结度困难，生活虽苦心里甜。

在严酷战争年代，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校园。无论住在哪里，上课无教室，夏天在树荫下，冬天在向阳的避风墙脚下，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数九寒天，哈开冻笔，用冻得麻木的手记笔记，即使找到间大房子，因为没有取暖设备，也是冷得厉害，老师冻得发抖，一只手插进裤兜里，一只手拿着书讲课，两只手不停地倒换着。人们常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战争年代的生活及装备。事实上，我们学校连小米也经常吃不到，多半吃玉米面糊糊或玉米饼子，有时吃黑豆及带壳的高粱面粥；经常吃不到菜，为了下饭，冬天，我们自备一小袋盐和





辣椒面，夏天，我们挖野菜。由于长时间吃不到蔬菜，同学们患夜盲症的很多。吃的粮、用的柴，经常是同学们到几十里以外去背。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大家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亲密团结、互助友爱。师爱生，生尊师，形成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下课后，老师顾不得休息，被同学围着解答问题。晚上上自习，每个班七八个人围在一盏棉籽油灯下做功课，老师静悄悄地坐在一旁等待解答问题。师生真正是生活、劳动在一起，学习、战斗在一起。

“在困难的环境下，互助友爱更伟大……”这支响亮的歌曲，我们天天唱，同时，也是天天这样做的。尤其是男同学对女同学倍加关心，在平时生产劳动中，他们抢重活干；在行军中，他们抢着给女同学背背包；在紧急情况下，他们把自己安危置之度外，而首先考虑的是女同学。当然，女同学也是关心男同学的，除了给他们缝缝补补外，还在劳动上、学习上同他们互相鼓励，开展革

命竞赛，在大生产运动中，有许多女同学被评为劳动模范。

学校有学生会，这是学生自己的组织，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大家可以竞选。学生会有总会、分会，设主任和委员，工作非常活跃，不仅推动了学习，更主要的是锻炼了同学们的才干。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在战火中度过了青春的同学们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深厚的革命情谊仍然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怀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教师和同学，想念一同努力的老同学、老战友。当年的教师们，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该是多么的高兴啊！他们殷切地期待着老同学们焕发出当年的青春活力，拿出战争年代那股劲，发扬光荣传统，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者刘志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中学部学员）



《 期 盼 》

设计：吴文越（人大艺术学院副教授）

